

# 平原上盛開的紅花——

## 論李佩甫《羊的門》的烏托邦書寫\*

鄒文律\*\*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通識教育系

### 摘 要

李佩甫描繪中國農村「呼家堡」的小說《羊的門》於 1999 年出版後，風行一時，旋即受政治力量干預而停止發行。過去對此書的評論雖涉及烏托邦面向，但是似乎未見從烏托邦書寫角度對「呼家堡」形象背後意識型態的歷史淵源進行深入分析，以及考察小說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發展的關係，這兩點正是本文關注所在。首先就「呼家堡」是一個實現了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分析它與「烏托邦」、「毛式烏托邦主義」和「新集體主義」等義理間的歷史淵源。接著，探討呼天成的領袖形象，以及領袖和民眾之間的關係，說明呼天成的人物形象在新時期中國文學上的獨特意義，以及長期存在於中國農民心底對「救主」的期盼。最後探討《羊的門》的烏托邦書寫之意義——「呼家堡」做為歷史出路的另一假設，展現了作家對於中國社會的批判與思考。

**關鍵詞：**李佩甫，《羊的門》，烏托邦，毛式烏托邦主義，新集體主義，新時期中國文學

---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香港亞洲研究學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辦「第六屆香港亞洲研究學會年會」，香港：2011 年 5 月 4-5 日。後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寶貴建議，始修訂而成，筆者在此謹致謝忱。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mlchau@vtc.edu.hk

## 一、前言

1990 年代，中國文學呈現多元的價值取向，不像 1980 年代那樣出現主導性的文學思潮，用陳思和的話來說，即踏入了文學的「無名」時代。陳思和認為，在那個「無名」時代裡，作家都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寫作，有的堅持純文學路線，希望作品得到文壇行家和文學研究者認可；有的以宣傳主旋律為己任，創作受官方意識形態認可的文學作品；有的轉向個人化寫作，以挖掘個人的內心世界為寫作目標；也有投身於大眾消費文化的寫作者，務求寫出受市場歡迎的作品。文學逐漸擺脫時代「共名」的制約，作家可以在相對自由輕鬆的環境裡創作自己喜歡的作品，關注自己認為重要的社會議題。<sup>1</sup>

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長篇小說《羊的門》，就是一部在「無名」時代以烏托邦書寫來思考「個別」的農村地區（「呼家堡」），如何把握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憑藉新集體主義來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小說。《羊的門》首次刊登於《中國作家》1999 年 4 月號，並於同年 7 月由華夏出版社出版單行本。<sup>2</sup>《羊的門》甫一出版便引起極大轟動，據當年出任華夏出版社負責人的陳行之憶述，第一版三萬冊很快銷售一空，一個月內再版了五萬冊，<sup>3</sup>盜版蔚然成風。<sup>4</sup>書籍暢銷和評論界的肯定是一致的；<sup>5</sup>《小說評論》在 2000 年第一期更規劃辦了一個「《羊的門》評論小輯」，刊載了三篇《羊的門》的評論。<sup>6</sup>當中丁增武認為：「《羊的

<sup>1</sup>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 12-13。

<sup>2</sup> 李佩甫，〈羊的門〉，《中國作家》，4（北京：1999），頁 4-141；李佩甫，《羊的門》（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本文之引用，皆出於單行本。

<sup>3</sup> 陳行之，〈在思想者陣地上沒有中國當代文學的身影〉（<http://chenxingzhi.blogchina.com/509392.html>），2013 年 2 月 4 日下載。關於這部小說當年的暢銷情況，可詳見林之為民，〈暢銷小說《羊的門》印象（一）〉，《大公報·集萃》（香港），1999 年 9 月 19 日，版 C07。

<sup>4</sup> 學爾，〈文學作品怎能「克隆」〉，《中國化工報·天地爐》（北京），2000 年 9 月 14 日，版 7。

<sup>5</sup> 孫蓀指出《羊的門》一出版就引起了轟動。詳見何弘，〈眾說紛紜《羊的門》〉，《莽原》，6（鄭州：1999），頁 281。張宇回想起當日的情景，說：「由於我和李佩甫住隔壁，他的《羊的門》忽然走紅，大冬天烤熟了我的一面牆。」張宇，〈打開《羊的門》〉，《當代作家評論》，3（瀋陽：2000），頁 24。

<sup>6</sup> 三篇文章分別為丁增武，〈「批判」的恢復——析《羊的門》的主題意向〉，《小說評論》，1（西安：2000），頁 34-37；黃書泉，〈長篇小說閱讀札記〉，《小說評論》，1（西安：2000），頁 38-44；李伯勇，〈「村婦性生存」的全息裸示——《羊的門》閱讀筆記〉，《小說評

門》的出現無疑是世紀末文壇的一件大事，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文學創作重返社會中心之努力的碩果」。<sup>7</sup> 後來，孟繁華在《中國當代文學通論》則稱譽《羊的門》「是一部充滿了內在文學力量的作品，是包括中原文化在內的傳統中國文化重構後對當下中國社會和世道人心深切關注和透視的作品」。<sup>8</sup>

然而，這部熱賣小說據說影射了「河南省什麼地區什麼縣什麼公社」所屬的南街村而招來政治力量的干預，<sup>9</sup>「有關管理部門」要求出版社對《羊的門》進行「內容自查」，結果出版社只好「停止發行，發行出去的圖書如數追回」。及後，「在有關管理部門召開的部分出版社社長、總編輯通氣會上，《羊的門》被點名批評」。<sup>10</sup> 直到 2009 年《羊的門》始有再版機會。世事難料，這次再版由作家出版社負責，並將其置於「共和國作家文庫 1949-2009」——這是中國作家協會為了慶祝建國六十年而策劃的項目，《羊的門》更「入選新聞出版總署『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百種重點圖書』選題目錄」。<sup>11</sup>

對於這部引起過政治力量干預的小說，相關研究並未因此間斷。蔣興普曾歸納出《羊的門》的四個主要研究方向：第一，小說歷史文化反思和批判性研究；第

---

論》，1（西安：2000），頁 45-49。

<sup>7</sup> 丁增武，〈「批判」的恢復——析《羊的門》的主題意向〉，頁 34。

<sup>8</sup> 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通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頁 369-370。

<sup>9</sup> 南街村位於河南省潁平縣，號稱「中原第一村」。改革開放初期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來在南街村村黨支部書記王宏斌帶領下，高舉毛澤東（1893-1976）思想為旗幟，重新走集體主義的道路。1993 年 12 月 26 日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更提出了「建設南街村共產主義小社區」的設想。該村在集體所有制下興辦企業，成為河南省「首富村」。村民月薪一律兩百五十元（全村以「二百五」自詡，即傻子之意），吃穿住全由村裡負擔，家家有冷暖氣、電話電視，看病免費，包養老送終。從村領導到普通村民，裝修設備都是一個標準和模式。南街村從 1984 年開始堅持「大學毛澤東著作，大唱革命歌曲，大學雷鋒」的活動。廣播站和電視臺一天廣播三次，開始一定是播放〈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會主義好〉；村民和外來工人每日早上要參加升旗儀式，然後列隊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號，再去上班。詳見劉倩，《南街社會》（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 19-22；〈今日南街村〉，《中國改革報·世紀風》（北京），2000 年 11 月 14 日，版 8；〈漯河——中原一顆璀璨的明珠〉，《大公報·河南新聞》（香港），2000 年 8 月 18 日，版 D03；〈奉行共產衣食無憂〉，《明報·中國》（香港），2004 年 2 月 27 日，版 A25。

<sup>10</sup> 陳行之，〈在思想者陣地上沒有中國當代文學的身影〉。陳萌曾指出：「像李佩甫那樣大膽揭露官場上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無疑會被某些人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陳萌，〈萬般風情，寫透官場——讀《官場故事》〉，《大公報·書話》（香港），2000 年 3 月 12 日，版 C02。由此可見，《羊的門》出版後遭到政治力量干預實屬可以理解。

<sup>11</sup> 〈《共和國作家文庫》首推 80 部〉，《光明日報·讀書》（北京），2009 年 10 月 21 日，版 12。

二，對小說主人公呼天成形象研究；第三，對作品中男權意識的批判研究；<sup>12</sup> 第四，將《羊的門》置於李佩甫整體文學創作中的分析研究。<sup>13</sup>

誠如蔣興普所言，論者對《羊的門》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國民性批判的層面。<sup>14</sup> 至於對呼天成的人物形象分析，大都不離他的人物性格與中原文化（孟繁華認為「中原文化也就是中國農民文化」）之間的關聯立說。<sup>15</sup> 即或有論者如王洪輝、郝崇視小說中描述的「呼家堡」「宛如一個現代烏托邦」，<sup>16</sup> 又或者像李洱那樣認為「這部小說的背景是烏托邦破滅之後的現實」；<sup>17</sup> 始終未見從烏托邦書寫的角度深入分析「呼家堡」形象背後意識型態的歷史淵源，考察小說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進程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正是打算由此切入，首先分析「呼家堡」與「烏托邦」(Utopia)、「毛式烏托邦主義」(Maoist utopianism) 和「新集體主義」三者的關係。接著，會探討呼天成的領袖形象，以及領袖和民眾之間的關係，藉此說明呼天成的人物形象在新時期中國文學上的獨特意義，以及長期存在於中國農民對「救主」的期盼。最後，本文會論及《羊的門》的烏托邦書寫之意義——「呼家堡」做為歷史出路的另一假設，展現了作家對於共和國歷史的批判，以及農村的「共產烏托邦」之路可以如何走。

<sup>12</sup> 論者多數認定《羊的門》表現了一種男性中心主義，小說的男性角色往往對女性角色缺乏同情，例如劉思謙便批評「呼天成對女人的佔有與剝奪是最全面最徹底也是最殘忍的。」劉思謙，〈卡理斯馬型人物與女性——《羊的門》及其他〉，《當代作家評論》，3（瀋陽：2000），頁 36。胡永吉認為《羊的門》是「站在男權中心立場來描寫家族女性的。」胡永吉，《李佩甫家族小說與文化選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頁 28。

<sup>13</sup> 蔣興普，《呼天成與呼家堡的命運》（吉林：吉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頁 7。李博微從「權力崇拜意識」、「『小處活人』的生存策略」、「『外圓內方』的官場哲學」三方面來分析《羊的門》的小說主題，並結合李佩甫其他小說綜合討論，屬於把《羊的門》放於李佩甫整體文學創作中分析研究的論文。詳見李博微，〈論李佩甫小說的文化批判主題〉，《開封大學學報》，21.1（開封：2007），頁 35-37。

<sup>14</sup> 蔣興普，《呼天成與呼家堡的命運》，頁 6。

<sup>15</sup> 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通論》，頁 371。

<sup>16</sup> 王洪輝、郝崇，〈《羊的門》的家族神話與悲劇性反諷——陷落的烏托邦〉，《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3（吉林：2003），頁 12。郭力則稱「呼家堡」為「道德烏托邦」。詳見郭力，〈穿行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寓言寫作——《羊的門》閱讀札記〉，《北方論叢》，6（哈爾濱：2000），頁 105。

<sup>17</sup> 何弘，〈眾說紛紜《羊的門》〉，頁 285。所謂「烏托邦破滅之後的現實」，顯然是指中共建國後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而發動的烏托邦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動亂與災難。

## 二、豫中平原上盛開的紅花——「呼家堡」背後義理的歷史淵源

本文在討論「呼家堡」反映的烏托邦理念前，先解釋其背後義理的歷史淵源，涉及「烏托邦」與「毛式烏托邦主義」，最後轉向「新集體主義」。「烏托邦」一詞最初由英國人托馬斯·摩爾 (Thomas More, 1478-1535) 於 1516 年所創，亦成為他當年出版的拉丁語著作的名字。《烏托邦》一書分成兩部分，根據克里尚·庫瑪 (Krishan Kumar) 的考察，拉丁文“Utopia”是根據晚期希臘文的模式所創製而成，由兩個希臘文字根“ou”和“topos”組成，“ia”則是當中隱含的字尾。“ou”是「沒有」(not) 的意思，“topos”則指「一處地方」(a place)，合起來就是「不存在的地方」。不過，希臘文另有一個字根“eu”，發音和“ou”相同，而“eu”則是「美好」(good or well) 的意思。因此，烏托邦既可以指一處「不存在的地方」，又可以指「美好的地方」。<sup>18</sup> 謝江平便指出，「在烏托邦所描繪的人類圖景中，一切社會矛盾都得到了徹底的解決。」<sup>19</sup> 因此，烏托邦是一切歷史階段的最佳圖景，是人類社會最終的解決方案，不容更改。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1931-2012) 在《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一書中，詳細地討論了毛澤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三者的關係，以及毛主義 (Maoism) 當中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成分。<sup>20</sup> 毛主義就像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所言，帶有各種中國思想傳統的痕跡。<sup>21</sup> 因此，毛澤東心目中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必定帶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色彩；慈繼偉將之命名為「毛式烏托邦主義」。<sup>22</sup> 本文並非探討毛式烏托邦主義的專論，只擬就當中的三個重要特徵：「集體富強」、「公有制」和「均平」思想，結合《羊的門》進行文本分析，以及改革開放後轉進的「新集體主義」。

<sup>18</sup> Krishan Kumar,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8.

<sup>19</sup>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21。

<sup>20</sup>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pp. 3-27, 118-131.

<sup>21</sup> Arif Dirlik, *Marx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 95.

<sup>22</sup>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5.

### (一)「呼家堡」與烏托邦

卡爾·曼海姆 (Karl Mannheim, 1893-1947) 曾指出：「我們把所有超越環境的無論如何都具有改變現存歷史——社會秩序的作用思想（不僅僅是願望的投入）都看作是烏托邦。」<sup>23</sup> 這意味著烏托邦必定是現存社會秩序的一次顛覆，從對現存世界的不滿中誕生。《羊的門》選擇的場景——豫中平原的生存狀況將會告訴我們「呼家堡」，亦即《羊的門》描繪的烏托邦空間所欲對抗的黑暗與不幸，以及追求的理想價值。小說的第一章第二節〈三千年留下的一句話〉便以編年的方式，寫下了豫中平原從春秋至清末的歷史：

在很久很久以前，這塊平原，這塊古老的土地，也曾是一個國家。一個記錄在文字上的國家，叫做許國。

據史載：許人立國不久，即慘遭戰亂。先有鄭人伐許，宋人伐許，晉人伐許，衛人伐許……許人顛沛流離二百餘載！

戰國初，許地再次瓜分，隸屬韓魏。秦二世三年，先有沛公南攻許地，屠之；獻帝三年，又有李覺、張濟掠許地，所過殺無遺！

西晉迄南北朝時期，事變劇烈，尤過前代。永興二年，劉喬攻許；永嘉二年，王彌陷許；十二月，太傅越帥甲兵四萬戰許；太清二年，大都督劉豐生將步騎十萬屯許……前後兵甲鋸民長達一百八十餘載！

隋唐之際，貞觀四年秋，許地大水。嗣聖七年，許地大雹。繼又有安史之亂，安祿山遣兵克許，遍地烽煙，民慘遭巨禍。永貞二年，許地大旱；十二年，許地大雨，民溺死者不計其數；元和九年九月，吳元濟掠許，許人恐，竄伏於荊棘間，為其殺傷驅剽者不計其數；可謂蹄蹄見血！

五代、北宋間，淳化元年六月，許地大風雹，壞民舍一千五百區！至道二年許地蝗食苗；寶元五年，許地地震；慶曆七年，又震；至元四年，霖雨害稼，麥禾不登；十九年，蝗食害稼，草木皆盡，大饑！

明弘治六年六月，大旱；秋八月，大水；冬，大雪，平地三四尺，民多凍死！正德十四年，地震，房屋搖動，民大恐！萬曆十六年，大疫，死亡枕藉！二十一年，大水，禾稼盡，人相食！十四年二月，李自成破許

<sup>23</sup> 卡爾·曼海姆著，姚仁權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195。

地，所到之處，老稚無存，房屋盡毀，許地洗劫，尤以此次備極慘痛！清康熙十一年，大雨；十五年，地震；十六年雨雹；夏，大疫；秋，大蝗；是歲大饑，人相食！咸同之際，太平天國起於前，裕匪、皖匪亂於後，往來馳騁，竄擾許地屢屢，計十五年，民苦不堪言！宣統三年，辛亥，武昌革命軍起，許地西、南土匪蠢動；冬十月，盜匪蜂起，鄉民大擾……。<sup>24</sup>

李佩甫刻意透過編年的方式，由春秋時代的許國直到民國初年，臚列豫中平原經歷過的各種天災人禍，並以「死亡枕藉」、「備極慘痛」、「苦不堪言」等感情色彩濃烈的字眼來加以渲染，目的是為了指出豫中平原的艱難生活狀況連年如是。嚴苛的生活讓人異常渴求得到安全感，具體來說就是「一個避難之所，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sup>25</sup> 因此，為自己建造一個「精神外殼」——擁有堅實物質特性的「屋」，就是人們在平原上畢生追求的目標。<sup>26</sup> 正如加斯東·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 所言，「家屋取得了人類身體所具有的物理能量和精神能量」，與人類組成一種「動態共同體」，讓人獲得了跟宇宙或世界對峙的能量。<sup>27</sup> 由此可見，「屋」的樣式反映了建屋者的理想與追求。生於農民之家的呼天成，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豫中平原的「呼家堡」建成了一排排物質條件現代化、美麗而整齊劃一的村舍，在社會主義中國壘起了一個烏托邦，為「呼家堡」的居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呼家堡」和烏托邦之間最明顯的聯繫見於村支書（共產黨的村黨支部書記）呼天成的自我期望：「他要在呼家堡建一座理想的『新村』！」<sup>28</sup> 「新村」的名字不禁讓讀者想起二十世紀在中國和日本出現的一系列「新村運動」，而這場運動與烏托邦社會主義關係密切。1918年，日本學者武者小路篤實 (1885-1976) 在日本九州日向領導了一場「新村運動」，<sup>29</sup> 致力建立一個「無剝削、無強權、無壓迫」的集體農場，<sup>30</sup> 在生活上實踐共產主義原則——「新村」中人需要放棄私有財

<sup>24</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3-4。

<sup>25</sup> 同前引，頁8。

<sup>26</sup> 同前引，頁8-9。

<sup>27</sup>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2003），頁116。

<sup>28</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230。

<sup>29</sup> 李永熾，〈近現代的烏托邦世界〉，《當代》，61（臺北：1991），頁31。

<sup>30</sup> 辛田，〈「五四」時期社會主義的嘗試與反思〉，《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產，好實現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對共產主義社會提出的著名觀點：「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生活所需全部由「新村」供應。<sup>31</sup> 在武者小路篤實的計畫中，「新村」最後會走上現代化之路，擁有音樂廳、圖書館、學校、醫院等，並會免費對公眾開放。<sup>32</sup> 武者小路篤實發起的「新村運動」最後在營運資金不足和政府壓力下以失敗告終，<sup>33</sup> 但「新村運動」卻影響了一海之隔的中國。

1919 年周作人 (1885-1967) 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翻譯了武者小路篤實的文章，並附上個人評價。<sup>34</sup> 周作人認為參考日本的「新村」經驗，中國的知識份子和年輕人可以建立一個蘊含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烏托邦，途中毋須經過暴力的無產階級革命。<sup>35</sup> 周作人甚至在 1920 年成立了「新村」的北京支部，<sup>36</sup> 希望在中國推動「新村運動」。雖然這個支部只維持了一年，<sup>37</sup> 但「新村運動」在中國的影響不小，甚至啟發了青年毛澤東。毛澤東在 1921 年投身馬克思共產主義之前，曾經在 1918 年的夏天，與蔡和森、張昆第等人計畫在長沙的岳麓山成立工讀同志會，從事半耕半讀。<sup>38</sup> 後來毛澤東在 1919 年 12 月的《湖南教育月刊》發表了〈學生之工作〉一文，不單明確提到日本的「新村運動」，<sup>39</sup> 更提出了理想中的「新村」模式。<sup>40</sup> 謝江平曾指出，烏托邦思想家在反傳統的同時，更有一種抹除一切，重新開始的想法。<sup>41</sup> 「新村」之「新」，顯然就有去舊迎新之意，而毛澤東的「新村」設想，亦充分反映了他的烏托邦主義傾向。

---

29 增刊 (西安：2000)，頁 309。

<sup>31</sup> William C. L. Chow, "Chou Tso-jen and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 *Chinese Studies*, 10.1 (1992), p. 111.

<sup>32</sup> 同前引。

<sup>33</sup> 同前引，頁 113。

<sup>34</sup> 同前引，頁 114。

<sup>35</sup> 同前引。

<sup>36</sup> 同前引，頁 116。

<sup>37</sup> 同前引。

<sup>38</sup> 同前引，頁 120-121。

<sup>39</sup> 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暨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頁 455。

<sup>40</sup> 毛澤東理想中的「新村」就睡眠、工作、自習的時間分配進行了規劃，亦提到要興辦公育兒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博物館、公共劇院、公共農場等現代化設施。同前引，頁 450-454。

<sup>41</sup>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頁 82。

## (二)「呼家堡」與毛式烏托邦主義

年輕的毛澤東最終放棄了這個「新村」計畫，亦沒有避開以暴力發動無產階級革命。然而，「新村」的確反映了毛澤東對「集體富強」、「公有制」、「均平」理念的重視。<sup>42</sup> 這些理念又成為他日後發動「大躍進」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思想資源，<sup>43</sup> 共同構成了毛式烏托邦主義的重要成分。由此可見，建「新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裡有著特殊的象徵意義——「新村」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顯影。事過境遷，這一切以完美主義理想來憧憬未來社會，甚至嘗試把它實踐於現實世界的努力，都因為全面失敗而被貶稱為烏托邦運動。現實的「新村」雖然無法築成，《羊的門》描繪的「新村」卻獲得空前成功，以「公有制」實現了「集體富強」，在分配上更做到了「均平」。

### 1. 「集體富強」——毛式烏托邦主義的承諾

呼天成之所以萌生興建「新村」的念頭，源於他參觀大寨的經驗。<sup>44</sup> 值得注意的是，大寨令呼天成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那一排排新圈的窑洞」。<sup>45</sup> 敘述者如此描述呼天成的心情：

尤其是晚上，那一排排、一層層的燈光，就像是一列列行進中的火車一樣，很震人哪！於是，在回來的路上，他就想好了，他要扒掉一家一戶的舊宅，建新村。<sup>46</sup>

<sup>42</sup> 從〈學生之工作〉一文可見，工讀同志會是一個「集體」勞動和學習的團體。強調團體「由學生各個私物之聯合」可見出其「公有制」之精神。若然要支持公共劇院、公共博物館等設施的建立和運作，「新村」則非「集體富強」不可；從毛澤東為一切設施冠以「公共」的前綴可見，設施乃大眾共享；加上毛澤東提到社會改革最終追求的目標乃是勞動者的「完全之平均分配」，更見「新村」的「均平」色彩。

<sup>43</sup> 1958年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發動的全國農村普遍建設人民公社運動，當年的「新村運動」正是其理念根源之一。詳見關向光，〈一九五八年中國大陸人民公社之產生及其理念根源〉，《東亞季刊》，33.2（臺北：2002），頁20-22。

<sup>44</sup> 小說提及的大寨就是「大寨村」，位於山西省昔陽縣城東南五公里的虎頭山下。1958年，大寨成立人民公社；1964年，毛澤東接見當時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並向全國號召「農業學大寨」，「大寨村」因而聞名全國。詳見宋連生，《農業學大寨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頁3、114-115。

<sup>45</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229。

<sup>46</sup> 同前引。

大寨「燈光」之所以吸引著呼天成，並引起了他產生「行進中的火車」的聯想，不僅因為「大寨新村」的外觀，<sup>47</sup> 更在於他嚮往器物層面的現代化及隨之以來的富裕物質生活，因為這兩者乃是「富強」的明顯指標。這種對於「富強」的嚮往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畢竟物質條件的改善才能讓「呼家堡」的人在平原上擁有堅固的「精神外殼」。李佩甫在第一章第五節〈平原上的一個傳說〉裡，藉敘述者如此描述「呼家堡」的「新村」：

當你走進呼家堡的時候，你會發現，正如路人所言，這 的村舍的確是一排一排、一棟一棟的，看去整齊劃一，全是兩層兩層的樓房。那樓房的格局是一模一樣的；一樣的房瓦，一樣的門窗，一樣的小院，院子有一模一樣的廚房和廁所。你一排一排地看下去，走到最後時，卻仍然跟看第一排時的感覺一樣。爾後，你推開一家小院的門，徑直走進去，你會驚訝地發現，這 的房門全都是不上鎖的。那你就大膽地走進去，看一看這戶人家吧。抬起頭來，你自然第一眼就看見了掛在門上方的一個紅色的小木匣子，那個小木匣子四四方方的，前面是鏤空著，在鏤空的地方，刻的是一個紅五星，不用說，這一定是個小喇叭了。緊接著，你就會看到掛在玻璃窗後面的窗簾，那窗簾是淡藍色的，上有竹樣的圖案。門兩旁和屋後掛的窗簾竟是一樣的顏色，一樣的幅面，一樣的長度。接下去，你會看見擺放在屋子 的沙發。那沙發是全包的那種，看上去很大很結實也很笨重，沙發上也全都套有白色鑲藍邊的包套，十分注目。沙發總共有三隻，兩隻單人的，一隻雙人的。兩隻單人沙發中間隔著一個暗紅色漆面的小茶几，對面擺放的則是那只雙人沙發，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小型的會議室。

接下去，你的目光會從一些家具上掃過，回過身去，就看見了貼在茶几上方的畫像，那畫像並不大，小幅的，有一尺見方，是照像製版後印出來的那種。你貼上前去，會發現那是一個老人的畫像。老人的臉很闊，是一張有棱角有皺褶的國字臉，眉毛很濃，很黑，鼻樑很高，眼細細地眯著，可那光一下子就從睫毛 透出來了……讓人不由地肅然。

<sup>47</sup> 宋連生如此形容「大寨新村」：「大寨新村的住房設計也很獨特。它倚著山坡，建起一排排石窟，石窟上面，又蓋起了一排排青磚瓦房。遠處望去，像是一片樓房，又像是一列列的火車車廂。所以人們說它是『似樓非樓』的『車廂新居』。」宋連生，《農業學大寨始末》，頁 84。

當然，你不會就這麼只看一家，你肯定想多看幾戶人家。那麼，假如你一家一家地看下去，你很快就會發現你是進了一個迷宮。你馬上就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看花眼了？走錯門了？你看，你又進了一戶人家，卻發現房子的格局是一模一樣的，房間的佈局是一模一樣的，連傢俱擺放的位置也是一模一樣的；一樣的小院，一樣的廚房，一樣的小喇叭，一樣的窗簾，一樣的沙發，一樣的掛鐘，一樣的彩電，一樣的空調，一樣的貼著一個老人的畫像……再走一家，再走一家，你的頭就暈了，你也不知道你是走到哪裡去了。你會不斷地問自己，是不是有病了？見鬼了？<sup>48</sup>

能夠把一條普通農村的房舍建成全部都是兩層的樓房，<sup>49</sup> 而且能夠戶戶配上各式現代化家電和沙發，即使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中國河南的農村都屬罕見，更何況是小說描述的 1980、90 年代。無怪乎省裡的一位領導來參觀時，呼天成自豪地說：「呼家堡沒有一個人願意脫離集體，打都打不走啊！」領導也笑著說：「你們是平原一枝花，富啣！」<sup>50</sup> 憑著鄧小平 (1904-1997) 推進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機遇，呼天成以超卓的經營智慧實現了當地人畢生的理想——讓「呼家堡」的所有人都住上舒適穩固的「屋」。「房門全都是不上鎖」表明了「呼家堡」的人完全不用擔心偷盜問題，過著安穩的生活。

如果中國社會懷著一種「超越貧困的夢想」來接受社會主義的話，<sup>51</sup> 馬克思主義無疑為中國帶來了一種貧窮可以被永久移除的信仰。<sup>52</sup> 畢竟，「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社會的承諾。<sup>53</sup> 但承諾要得到兌現，必然需要在物質非常豐裕的狀態下，才能做到真正的「按需分配」。根據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的「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貧乏狀態根本無法達到「按需分配」。<sup>54</sup> 這樣說來，「集體富強」成為了實現承諾的前提。因此，

<sup>48</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10-11。

<sup>49</sup> 建成後的「呼家堡」新村，和「大寨新村」的外貌可謂如出一轍。從《農業學大寨始末》一書的照片可見，「大寨新村」的樓房全是一模一樣，一排排的兩層樓房，與「呼家堡」非常相似。詳見宋連生，《農業學大寨始末》，頁 84-85。

<sup>50</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63。

<sup>51</sup> 金觀濤、劉青峰，《新十日談：關於文化重建與中國前途的對話》（香港：天地圖書，1990），頁 23。

<sup>52</sup>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p. 147.

<sup>53</sup> 莫里斯·邁斯納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 4。

<sup>54</sup>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p. 143.

呼天成希望把「呼家堡」改造成一座「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新村」，<sup>55</sup> 與毛式烏托邦主義的享樂主義 (hedonistic) 和物質主義 (materialistic) 的視野別無二致。顧彬 (Wolfgang Kubin) 評論新時期改革文學代表作——高曉聲 (1928-1999) 的〈李順大造屋〉就指出，農村對社會主義的期望，從來沒有超出「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不談政治權力的單純的物質性事件)的水平；<sup>56</sup> 對於李順大而言，「搞社會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主要也是造房子」。<sup>57</sup> 1978年12月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領導的共產黨決定了「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邁斯納認為這意味著所有的工作都要服從現代經濟發展的任務)，<sup>58</sup> 也不過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而從事生產力的提升。<sup>59</sup> 中共卻從未放棄建立一個「集體富強」的現代中國的夢想。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化的富裕生活在「呼家堡」並非「個別」，而是「集體」的情況。因為在「呼家堡」，「集體是一種信仰，是一種覺悟，要活在一塊兒活，死在一塊兒死」。<sup>60</sup> 這種把「集體」視為信仰的表現，與中國農民心裡縈繞的「集體主義」情結關係密切。孫隆基指出，「自古以來，中國人就認為大家必須生活在一個政治體中。」<sup>61</sup> 中國人需要一種「在一起」感，而這種「在一起」感直接與團結的傾向相關，<sup>62</sup> 積淀於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做為實踐「大躍進」重要手段的人民公社，當中強調的「集體」勞動，更是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在一起」感。毛澤東之所以發動「大躍進」，誠如汪暉所言，也是為了促成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的目標邁進，希望透過社會主義所有制來建立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sup>63</sup> 到了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後，它在農民心中仍然留下了不易消散的記憶。誠然，許多農民為人民公社挨過苦受過餓，但「大鍋飯」又確實養

<sup>55</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228-230。

<sup>56</sup> 顧彬著，范勁等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327-328。

<sup>57</sup> 高曉聲，《高曉聲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頁11。

<sup>58</sup> 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404。

<sup>59</sup> 根據中共在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言，中國大陸目前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就是社會主義低級階段。詳見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臺北：生智出版社，2003)，頁28。

<sup>60</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67。

<sup>61</sup>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165。

<sup>62</sup> 同前引，頁167。

<sup>63</sup> 汪暉，《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49。

活了不少農民。<sup>64</sup> 仰賴「集體」力量改善生活，希望「集體富強」，依舊是改革開放時期許多農民的憧憬，而這一切憧憬，在「呼家堡」都成為了事實。

## 2. 公有制——毛式烏托邦主義的制度特點

前文述及，「屋」的樣式反映了建屋者的理想與追求。「呼家堡」的房屋無論從外表到內部設計都是一模一樣的，就連房屋的家電和擺設亦一模一樣。這種對「整齊劃一」、「一模一樣」的講究自然讓人想起摩爾在《烏托邦》的經典描述：

我們只要熟悉其中一個城市，也就熟悉全部城市了，因為在地形所許可的範圍內，這些城市一模一樣。<sup>65</sup>

街道的布局利於交通，也免於風害。建築是美觀的，排成長條，櫛比鱗次，和街對面的建築一樣。各段建築的住屋正面相互隔開，中間為二十呎寬的大路。整段建築的住屋後面是寬敞的花園，四圍為建築的背部，花園恰在其中。每家前門通街，後門通花園。此外，裝的是折門，便於用手推開，然後自動關上，任何人可隨意進入。<sup>66</sup>

這種驚人的相似表現了《羊的門》與西方烏托邦書寫的勾連。拉賽爾·雅各比 (Russell Jacoby) 曾經把托瑪斯·摩爾到 B. F. 斯金納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1990) 的烏托邦書寫歸納為「藍圖派烏托邦」(blue print school of utopianism) 傳統。在這種傳統下，他們會詳盡地描繪烏托邦的模樣，為未來設想布局、精心闡釋、劃出界線；就像托馬索·康帕內拉 (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 在《太陽城》為居民的衣履服飾進行詳細設定那樣顯得富有啟發性，同時過於賣弄和瘋狂。「藍圖派烏托邦」的作者會給出房間的尺寸，桌椅的數目和作息的準確時間，彷彿暗示這一切皆確實可行。<sup>67</sup>

對於整齊劃一的追求，其實是為了實踐公有制鋪路。若要保持「集體」的利益與內部和諧，「呼家堡」和「烏托邦」都必須根除人性中的自私與貪婪。赫茨勒

<sup>64</sup> 劉倩，《南街社會》，頁 67-69。

<sup>65</sup> 托瑪斯·摩爾著，戴錫齡譯，《烏托邦》（臺北：志文出版社，2005），頁 93。引文底線為筆者所加，下同。

<sup>66</sup> 同前引，頁 95。

<sup>67</sup> Russell Jacoby,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1-32.

(Joyce Oramel Hertzler) 指出，摩爾的「烏托邦計畫的首要基本原則乃是財產公有。」<sup>68</sup> 廢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成為實現要求平等和消滅犯罪的最可靠辦法。」<sup>69</sup> 不單如此，「他要求在物質利益的分配上實行平等，以此作為不可或缺的基礎」。<sup>70</sup> 「烏托邦」和「呼家堡」千篇一律的建築設計就是為了廢除私有制服務——因為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模一樣的，對烏托邦人來說調換房子變得沒有所謂。人人都可以得到美麗的房子，只是房子美麗但沒有特色，整齊而沒有個性。差別被取消了，誘惑人民得到（無論透過什麼方式）別人房子和保住自己房子的因素於焉不復存在——人民沒有比較也沒有選擇，欲望被激發的機會也就減少了。如此，共產主義公有制得以暢通無阻，<sup>71</sup> 私有制的廢除成為可能。

摩爾透過敘述者希斯拉德表示：「在別的國家，人們固然談說公共福利，但所奔走打算的卻是私人的利益。在烏托邦，私有財產不存在，人們就認真關心公事。」<sup>72</sup> 「呼家堡」一直採用的就是「人民公社」式的分配制度：供給制和工資制相結合，<sup>73</sup> 取向上以公有制為主，小說幾乎沒有提到成員擁有什麼私產。這種建邦理念在呼天成訓斥存心謀私的王炳燦時清楚表明出來：

呼家堡是什麼地方？這是一塊淨地！這塊淨地是不允許有污染的。呼家堡只能有一個字，那就是「公」字，呼家堡不允許有「私」字！如果你想個人發財，那你就離開呼家堡！我說過多少遍了？呼家堡不是哪一個人的，呼家堡是個整體。今後呼家堡的攤子越來越大，要是你漏一點，我拿一點，那呼家堡不就成了老鼠窟窿了麼？集體還有什麼號召力？我看乾脆散攤算了！<sup>74</sup>

<sup>68</sup> 喬·奧·赫茨勒著，張兆麟等譯，《烏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131。

<sup>69</sup> 同前引。

<sup>70</sup> 同前引。

<sup>71</sup> 戴錙齡認為，「財產公有是烏托邦的最大特點」，而「整個烏托邦就是一個共產主義大家庭」。詳見托瑪斯·摩爾著，戴錙齡譯，《烏托邦》，〈譯序〉，頁15。

<sup>72</sup> 同前引，頁176。

<sup>73</sup> 人民公社的特點就是「一大二公」。「一大」即規模要大，「二公」，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以及領導體制（人民公社既是政權機構，又是經濟組織，亦對工、商、學、兵進行統一管理）和分配制度的「公」（由實行糧食、伙食、生活基本需要由公社承包的供給制和按勞所得的工資制，二者結合而成）；管理方式上，則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和生活集體化。詳見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4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212-214。

<sup>74</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377。

這個「公」可以有雙重的理解，分別是「集體」（公家）和公有制。在「呼家堡」，一切生活所需，不論是房子、家具、糧食、水、電，甚至中秋節吃的月餅，全是「村裏發的」；<sup>75</sup> 即使在堡外工作的人，因公職而收受的禮物，都必須上交。<sup>76</sup> 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那句名言——即是馬克思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sup>77</sup> 這在「呼家堡」幾乎成了一種現實。

### 3. 「均平」——毛式烏托邦主義的核心追求

程歡的研究指出，「均平」的意向是存在於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的巨大習慣力量，「均平—太平」的社會理想本來就深植於傳統中國農民的心中。<sup>78</sup> 這種均平主義思想後來更成為了毛澤東心目中真正共產主義的特色，<sup>79</sup> 乃是毛式烏托邦主義的顯著特徵。<sup>80</sup> 這種「均平」思想，在「呼家堡」除了見於村民居住的地方一模一樣外，就連每人所得的工資都是相同的：

1986 年是呼家堡最紅火的一年。在那一年裏，「呼家麵」的年產值首次超過了一個億。也就在那一年裏，呼天成為呼家堡人定了工資，工資是一樣的，上至呼天成，下至放羊的老漢，每人 250 元，呼天成說，人家說呼家堡人是「二百五」，咱就 250！<sup>81</sup>

不論你在「呼家堡」從事什麼工作，工資都沒有兩樣。<sup>82</sup> 然而，「均平」的工資其實也是「均富」的表現——在 1986 年，每人每月工資 250 元已經遠超同年現實中國的農村平均收入 7.08 倍，超過中國的城鎮平均收入 2.25 倍。<sup>83</sup> 村民如果在工

<sup>75</sup> 同前引，頁 378。

<sup>76</sup> 同前引，頁 377。

<sup>77</sup>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博古譯，《共產黨宣言》（北京：解放社，1949），頁 61。

<sup>78</sup> 程歡，《晚清鄉土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頁 79。

<sup>79</sup>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頁 184。

<sup>80</sup>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p. 145.

<sup>81</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373。

<sup>82</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呼家堡」生活，幾乎不必花費個人工資。供給制和工資制的結合似乎是為了暗示「呼家堡」延續了人民公社的傳統；統一的工資則強調「均平」的特色。

<sup>83</sup>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據農村住戶抽樣調查，1986 年中國農村農民平均每人純收入為每年 424 元人民幣，中國城鎮職工平均每人純收入為每年 1332 元人民幣。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於 1986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gb/>)

作上有什麼需要，呼天成都會滿足。例如負責銷售的王炳燦，呼天成就曾經批給他一輛舊的桑塔納，<sup>84</sup> 真正實現了「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承諾。

要言之，「呼家堡」是一個帶有強烈毛式烏托邦主義特徵的烏托邦。這是一個以「集體富強」為實踐目標，制度上大致採取「公有制」，價值上追求「均平」的烏托邦。在此我們再一次發現「大同」社會的影子縈繞不散——金觀濤和劉青鋒就指出，「大同」的價值取向本來就含有天下一家，取消貧富差別的成分。<sup>85</sup> 呼天成既是「呼家堡」的領袖，又是家長（當家）——「我是為全村人當家的，不是光為呼性人當家的。」<sup>86</sup> 然而，與毛澤東仰賴人民公社為手段不同，《羊的門》繪出的「呼家堡」，建造和維持烏托邦的方式，依靠的卻是中國推行改革開放後才出現的「新集體主義」。

### (三)「新集體主義」與「呼家堡」

「呼家堡」在文學淵源上可以上溯至摩爾筆下的「烏托邦」，政治理念上承襲了毛式烏托邦主義；它的運作模式，在中國社會現實上對應的則是「新集體主義」。王穎在 1992 年幾度深入南海市鄉村實地考察後寫成了《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一書，<sup>87</sup> 反映了中國持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下、鄧小平南巡後，中國鄉村社會發生的變化。根據他的研究，自從人民公社在 1982 年被否定，農村幹部一時陷入混亂之中。他們不知道是否應該繼續堅持集體經濟，還是把集體財產分配給各農戶才對。<sup>88</sup> 然而，能夠成功引領鄉村走上現代化道路的，不是私有化或私有制，而是以「共有制」為基礎、<sup>89</sup> 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新集體主義」。

---

ndtjgb/qgndtjgb/t20020331\_15380.htm), 2011 年 12 月 8 日下載。

<sup>84</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376。

<sup>85</sup> 金觀濤、劉青峰，《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收入《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第 1 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305。

<sup>86</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218。

<sup>87</sup> 王穎，《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頁 244。

<sup>88</sup> 同前引，頁 1-3。

<sup>89</sup> 所謂的「共有制」，中國大陸學者潘恩強視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沿用之「公有制」的一種新發展，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方法。它的特點是人人佔有生產資料，人人都是股東，致力解放生產力。「共有制」一方面以「共同富裕」為發展目標，明晰不同性質的所有權，同時承認有差距的先後富。至於分配制度上，則實行按勞分配和按股份分配兩種方式，與「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尚有區別。詳見潘恩強編，《論共有制與私有制》（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5），頁 214-234。

王穎解釋，這種「新集體主義」以個人利益為基礎，即集體利益建立在個人利益基礎之上，換言之，個人和集體利益基本一致，並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核心觀念是自覺自願，而非強制性的合作。在文化上，則體現了從家族觀念延伸出來的「泛家族意識」，基礎單位則是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行政性集體村落。<sup>90</sup> 這一切特點幾乎都體現在「呼家堡」之上——「呼家堡」在毛澤東時代，本身就是一個人民公社。<sup>91</sup> 「呼家堡」的所有人都尊稱呼天成為「呼伯」，待他一如家中長輩，遇事總需要他先點頭。<sup>92</sup> 「十法則」做為「呼家堡」人必須遵守的制度，包括的層面十分廣泛，從早晨和晚上播放的村歌、<sup>93</sup> 每天都要做的村操、<sup>94</sup> 每人當守的村規，<sup>95</sup> 到獎懲法與請假制度皆有觸及。<sup>96</sup> 完備的法則，確保了「新集體主義」烙在每一個「呼家堡」人心裡。的確，「呼家堡」之所以能夠發展成一條坐擁億萬資產，在全國各地城市都設有辦事處的「平原第一村」，<sup>97</sup> 全都是因為「呼家堡是一個整體」，<sup>98</sup> 人人無不為了「整體／集體」而自覺自願地勤懇工作；像民兵連長呼墩子，十年來竟沒有請過一天假。<sup>99</sup> 畢竟，個人為「集體」的付出，換來的是個人生活水平的提升。

不過，「呼家堡」在制度上比「共有制」更接近馬克思口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共有制」（據說是「公有制」的新發展）並不保證「均平」和「按需分配」的實現，但從本文第二節的分析可見，這兩點在「呼家堡」已成事實。如果撇開「呼家堡」在分配上依然保有的工資制（雖然是一種「均平」的工資），「呼家堡」儼然就是一個實現了的共產主義烏托邦。

<sup>90</sup> 王穎，《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頁 197-204。

<sup>91</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215-218。小說並未明確提到「呼家堡」是一個人民公社，但從「呼家堡」設有「大食堂」，呼天成曾經召開全村「社員大會」可見，「呼家堡」至少在「文革」期間是一個人民公社。

<sup>92</sup> 同前引，頁 349-350。

<sup>93</sup> 同前引，頁 243。晨曲是〈東方紅〉，晚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sup>94</sup> 同前引，頁 244。這套操共有八節，名為「呼家堡健身操」。

<sup>95</sup> 同前引，頁 245-246。村規共有五條，分別是「鐘聲就是命令」、「安裝在每家各戶屋門上方的『廣播匣子』不能關，更不能私自拆除」、「不許放屁」、「不准打架鬥毆、玩紙牌」、「不准養狗」。

<sup>96</sup> 同前引，頁 243-250。

<sup>97</sup> 同前引，頁 350-351。

<sup>98</sup> 同前引，頁 67。

<sup>99</sup> 同前引，頁 250。

### 三、「我就是羊的門」——「呼家堡」的領袖與民眾

王穎在探討「新集體主義」的成功時，特別指出領袖的重要性：「從南海經濟發達的管理區看，起決定性作用的『精英』人物，是管理區的黨支部書記」。<sup>100</sup> 他們擁有絕對的權威，於是被稱為「鐵腕精英」。<sup>101</sup> 他進一步談及：

在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下，能夠代表所有成員做出決策的、能夠擴大集體財產，並為大多數成員擁護的人，只能是集體社區的實際領導者：黨支部一班人，而不可能是個體和私營企業家。因為黨支部不僅具有政權基礎，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大大超過了單個私營企業資產的集體社區資產。政權與財權的統一，使黨支部成為社區決策的精英層，而集各種權力於一身的黨支部書記，則成了最具個人影響力和感召力的「鐵腕精英」。

只有那些發展集體經濟（不論是集體自己經營、招聘承包經營、還是與私人、國有企業聯營）的村落，才有可能形成集體社區，才有可能實現社區內的共同富裕，並創造良好的生存環境。在這樣的村集體社區中，一定存在一個團結一致的、以黨支部為核心的領導班子和集黨、政、經三權於一身的具有極高個人威望的黨支部書記。這是被各地經濟發達的村落所證實了一個客觀現實。<sup>102</sup>

王穎特別強調領袖——共產黨管理地區的黨支部書記（黨支書）的決定性作用。因為黨支部掌握了集體社區的政權和主要的社區資產，而黨支書又集黨、政、經三權於一身，因而可以成為帶領社區走向共同富裕的人。這些領袖之所以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愛戴，亦由於他們「一心為公，一心為集體的精神」。<sup>103</sup> 王穎的分析在虛構的「呼家堡」及現實的南街村皆得到證實。<sup>104</sup> 呼天成的身分是村支書，集

<sup>100</sup> 王穎，《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頁 181。

<sup>101</sup> 同前引。

<sup>102</sup> 同前引，頁 183-184。

<sup>103</sup> 同前引，頁 187。

<sup>104</sup> 劉倩曾對南街村進行調查，指出村支書「王宏斌是家長，是領袖，是領導權威。」根據劉倩的研究，南街村實行的亦是「黨政企」三位一體的領導模式。詳見劉倩，《南街社會》，頁 192-

「黨、政、經三權於一身」，無論是決定推倒舊宅建「新村」；<sup>105</sup> 還是決定更換麵粉廠的設備，全力生產「呼家麵」，<sup>106</sup> 都是呼天成做的決定。而且，呼天成在「呼家堡」的個人影響力和感召力，尤如王宏斌在南街村（他甚至是「罩滿神光的人格神」），<sup>107</sup> 是無人能及的。

評論者對於這位「平原第一村」的領袖一直深感興趣，在一場專門討論《羊的門》的座談會上，<sup>108</sup> 何向陽高度評價《羊的門》正是因為李佩甫創造了呼天成：

小說不僅塑造了呼伯這一幾十年來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文學形象，而且試圖探討這一人物性格產生的歷史文化水土。<sup>109</sup>

另一位評論者墨白則指出：

《羊的門》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我們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愚昧落後的人民，而真正使我們感到悲哀的是，那裏的人連對自己的反省、懺悔和罪惡感都是建立在喪失了自我之上的，從他們身上使我們看到了我們自己。<sup>110</sup>

何向陽和墨白的話成為了評論者後來在討論《羊的門》時的兩種主要分析方向：第一，呼天成和他的跟隨者的藝術形象；<sup>111</sup> 第二，這群人物形象所折射的歷史文化條件。<sup>112</sup> 不過，一般論者很少把上述兩點與烏托邦書寫連繫來討論，本節

---

194、295-298。

<sup>105</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228-230。

<sup>106</sup> 同前引，頁 364。

<sup>107</sup> 郭力，〈穿行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寓言寫作——《羊的門》閱讀札記〉，頁 105。

<sup>108</sup> 根據《莽原》的資料，這次座談會於 1999 年 7 月 29 日舉行，距離《羊的門》在《中國作家》第四期出版的時間，相距不足一個月。詳見何弘，〈眾說紛紜《羊的門》〉，頁 281。

<sup>109</sup> 同前引，頁 284。

<sup>110</sup> 同前引，頁 285。

<sup>111</sup> 郭力分析了呼天成如何「用了整整四十年的時間把自己成就為呼家堡的『主』進而成為罩滿神光的人格神」，同時論及他在成為「人格神」後，泯滅了良知與壓抑了情欲。詳見郭力，〈穿行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寓言寫作——《羊的門》閱讀札記〉，頁 107。

<sup>112</sup> 對於呼天成自覺為「主」的領袖意識，胡煥龍認為：「這種『無師自通』正是數千年封建專制文化在民族心底深厚積淀的結果。」胡煥龍，〈沉痛的歷史與文化反思——讀李佩甫長篇小說《羊的門》〉，《淮南師範學院學報》，4.4（淮南：2002），頁 43。對於《羊的門》的歷史文化反思和批判，論者多數採取國民性批判的進路。丁增武指出呼天成之所以能夠掌權，「基礎是許多

將會圍繞呼天成的人物形象，還有他與跟隨者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試圖深化前人討論之餘，說明呼天成的人物形象在新時期中國文學史上的獨特意義。

### (一) 呼天成的領袖形象

前文述及「新集體主義」時，特別提到呼天成是集各種權力於一身的黨支書。對於他的絕對權威，劉思謙就曾經借用了「卡理斯瑪」(charismatic) 來指稱，<sup>113</sup>不過他對此並未多作解釋，亦未直接引用韋伯的文獻進行討論。本文以劉思謙的判斷為基礎，進一步分析呼天成的烏托邦領袖形象。

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 論及「卡理斯瑪領袖」(charismatic leader) 時指出：

卡理斯瑪 (charisma)，指個人所具備的卓爾不群的特質，在別人心目中擁有神授天縱的超凡本領，志在替天行道，或者是完成某項特殊的歷史任務。在原始社會，這種特別的服從歸與先知，擁有和具備此種特質而被擁戴為領袖的人，就稱為卡理斯瑪領袖。如何鑑定這些特質，或者該人是否真的具有這些特質，是不必深究的，重要的是他在隨眾心目中具有這些特質。<sup>114</sup>

《羊的門》有一個片段，非常能夠體現出「呼家堡」人對呼天成的「卡理斯瑪」的承認。那就是當呼天成號召眾人完成他心目中的烏托邦計畫——建「新村」的時候：

就這樣，一村人，一村人哪！在都還沒愣過神的時分，就都乖乖地跟著

---

平原民眾的愚昧和人格的孱弱。」又，「《羊的門》對平原人萎靡退縮、安於現狀的人性批判則尖銳地指出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人的現代化問題。」丁增武，〈「批判」的恢復——析《羊的門》的主題意向〉，頁 35。陳宜良則從對《羊的門》的分析，指出「中國人的道德意識結構，並沒有根本的變化」，並藉著討論「呼家堡」的創建過程，回應中國社會「專制是如何成為可能的？」陳宜良，〈「我們」的道德意識結構——從小說《羊的門》說起〉，《開放時代》，3（廣州：2004），頁 145-147。

<sup>113</sup> 劉思謙，〈卡理斯瑪型人物與女性——《羊的門》及其他〉，頁 33-37。

<sup>114</sup> Max Weber, "The 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 in A. Etzioni and E. Etzioni-Halevy (eds.), *Social Change: Sources,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43. 此處譯文為筆者所譯，曾參考張德勝的翻譯。詳見張德勝，《社會原理》（臺北：巨流圖書，1986），頁 367。

他走了。這就是魔力，呼天成就有這樣的魔力！<sup>115</sup>

這種「魔力」，自然就是呼天成身上的卡理斯瑪。畢竟，光靠呼天成一人並不可能建成「新村」，他必須得到群眾的普遍支持。烏托邦計畫又不比尋常計畫，它要成就的是一個盡善盡美的社會。既然如此，烏托邦領袖必須把群眾組織起來，投身到改天換地的烏托邦工程之中。就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所言，烏托邦計畫的實現總是涉及總體性 (totality) 的。<sup>116</sup> 因此，烏托邦計畫要求「個體對群體的無條件屈從」。<sup>117</sup> 呼天成必須當上卡理斯瑪領袖，將諸多「個人」的目標轉化為「集體」的目標，凝聚眾人力量創建烏托邦。一如韋伯所言：

人民承認將卡理斯瑪的真實性及聽從其號令而行動，當成是自己的職責。由心理層面而言，這項承認是個人對擁有這些特質者的完全效忠和獻身。它來自狂熱、絕望或希望。<sup>118</sup>

的確，呼天成叫人們上晨操，人們就上晨操；要種帶色的棉花，人們就去種帶色的棉花；在會議上他說：「舉手吧。」人們就舉起森林般的手……。<sup>119</sup> 呼天成是帶領「呼家堡」人過上富裕生活的惟一保證；失去了他的話與絕望無異。民眾狂熱地崇拜呼天成，對他們來說，呼天成就像空氣一樣重要，沒有了他，「呼家堡人倒真不知道該怎麼活了。」<sup>120</sup> 當然，呼天成當上卡理斯瑪領袖，必須得到被支配者（民眾）對他的卡理斯瑪之承認，而這種承認在起初通常是由一項奇蹟來保證。<sup>121</sup>

這項奇蹟發生在呼天成當上村支書一年半後。「在那個時期，村裏總是丟東西。起初也許是由於飢餓，後來就是慣性了。」<sup>122</sup> 有一天，呼天成帶著六個基幹民兵，把三個在村裡抓到的小偷罰站在村口示眾，讓他們的脖子上都掛著偷來的莊

<sup>115</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228。

<sup>116</sup> Fredric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Verso, 2007), p. 4.

<sup>117</sup> 周仕寶，〈《1984 年》所揭示之烏托邦政治理念之負面效應〉，《淡江人文社會學刊》，11（臺北：2002），頁 98。

<sup>118</sup> 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編譯，《韋伯選集Ⅲ：支配的類型》（臺北：允晨出版社，1985），頁 70。

<sup>119</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349。

<sup>120</sup> 同前引。敘述者說：「在這裏，他（筆者按：呼天成）的聲音已經化成了人們的呼吸。」

<sup>121</sup> 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編譯，《韋伯選集Ⅲ：支配的類型》，頁 70。

<sup>122</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76-77。

稼。當呼天成等著抓到第四個小偷時，下工的村人全都走到村口，像牆一樣木然地看著那三個小偷，「看去就像是群狼咆哮前的沉默」。<sup>123</sup> 呼天成背對著群眾，強壓心中的恐慌，腦海裡忽然「想起了他十六歲時參觀北京故宮時的情景」：

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在故宮裏看到了皇帝坐的龍椅，那龍椅高高在上，氣勢磅礴，他一下子被震住了！他說不出來心裏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可他卻體味到了那無比的高貴和高高在上的威嚴！還有那皇宮的雄偉和九龍照壁的輝煌，都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那記憶瞬間在他的腦海裏放大了。<sup>124</sup>

呼天成就是在這一個瞬間自覺是人民的「主」——坐上龍椅，成為天下之主——這無疑是傳統中國皇權專制主義的延續。<sup>125</sup> 呼天成因此招來了一眾評論者的口誅筆伐；<sup>126</sup> 然而，評論者沒有注意到呼天成自覺與眾不同，立志要成為「卡里斯瑪領袖」的時刻亦由此而起。當呼天成轉過身來，不再看那些人臉，只大喊一字：「賊！」，然後再高聲喊道：「一窩賊！人沒臉，樹沒皮，百方難治！偷！偷吧，偷光，偷淨！」<sup>127</sup> 全村幾百人就給他鎮住了，後來更紛紛扔下偷來的莊稼回家去。<sup>128</sup> 呼天成雖然沒有逐個搜查，卻彷彿擁有神力一樣能夠看穿他們所做的事。至此，呼天成初步確立了他的權威和卡里斯瑪領袖的身分。

為了實現烏托邦，呼天成無可避免要取代各種妨礙他的權威。首先，他著手剷除平原上根深蒂固的迷信風俗，因為它代表的是平原上最牢固的事物——「習慣」。<sup>129</sup> 呼天成曾經把一條剛打撈上來，據說是淹死的小女孩小娥「魂靈」化身的金色小鯉魚活活捏死，並在村街中間的老槐樹下站了三天，與上天的鬼神約定，

<sup>123</sup> 同前引，頁 78。

<sup>124</sup> 同前引。

<sup>125</sup>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文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頁 344。

<sup>126</sup> 胡煥龍認為：「這是一幅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現代中國專制政治的象徵圖」，更把呼天成描述為「暴君」。詳見胡煥龍，〈沉痛的歷史與文化反思——讀李佩甫長篇小說《羊的門》〉，頁 43-46。丁增武則指出：「封建共產主義式的呼家堡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縮影，其內部現代的專制統治導致的是人民思想的停滯，人格的萎縮乃至人性的退化。」丁增武，〈「批判」的恢復——析《羊的門》的主題意向〉，頁 37。

<sup>127</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78。

<sup>128</sup> 同前引，頁 79-81。

<sup>129</sup> 同前引，頁 210。

如果鬼神有種就讓雷劈他。結果三天後，什麼事也沒發生。<sup>130</sup> 面對連鬼神都奈何不了的村支書，「村人們再見呼天成的時候，臉上就多了些敬畏。」<sup>131</sup> 後來，呼天成陸續戰勝了鄉土社會的「輩份」權威、<sup>132</sup> 外來宗教（基督教）的挑戰等，<sup>133</sup> 樹立起自己的無上權威。

不過，卡理斯瑪領袖的身分是一個需要持續確立的過程，「如果領袖無法繼續使跟隨者受益，他的卡理斯瑪支配很可能因此喪失。」<sup>134</sup> 這就意味著卡理斯瑪支配需要透過不斷地創造成功來維持，亦要讓卡理斯瑪領袖的跟隨者持續受益。呼天成在管治「呼家堡」的四十年裡，就像孫蓀所言，帶領「呼家堡」的人克服各種危機，步向繁榮：

他在二十歲左右的年紀開始擔任呼家堡的支部書記，在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裏，他帶領村民度過了六十年代初的飢餓，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進入了改革開放後的市場經濟時代。呼家堡不僅克服了時代帶來的一個個巨大難題，而且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尤其在市場經濟的複雜局面下，呼家堡卻不是左去右絀，窮於應付；相反卻是如魚得水，突飛猛進，步入輝煌。<sup>135</sup>

呼天成的名字有「天所成就的事，非人力所能及」之意思。對比建國以後中華大地經歷的各種人為動盪，「呼家堡」不僅能夠安然度過，更建成了一排排整齊劃一的村舍，完成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絕非等閒之輩所能成就。正如前文提到，卡理斯瑪領袖需要完成的特殊歷史任務，而呼天成的特殊歷史任務，就是要建設一條富裕的「新村」——他既要實現中國近代以來「超越貧困的夢想」，也要履行毛式烏托邦主義的未踐之約。

呼天成的人物形象與「新集體主義」下的領袖多有重合絕非偶然，而是李佩甫刻意指涉後毛時代中國社會現實的結果。然而，僅是把呼天成視作對王宏斌的影射，亦未免是一種過分簡化的詮釋。本文認為，農村當然可以透過「新集體主義」

<sup>130</sup> 同前引，頁 88-95。

<sup>131</sup> 同前引，頁 95。

<sup>132</sup> 同前引，頁 229-230。

<sup>133</sup> 同前引，頁 297-303。

<sup>134</sup> 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編譯，《韋伯選集Ⅲ：支配的類型》，頁 70。

<sup>135</sup> 何弘，〈眾說紛紜《羊的門》〉，頁 290。

踏上富強之路，但要在改革開放的洪流中成功，農村生產的產品一定要能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是，面對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時，這位領袖又能否戰勝一切誘惑和考驗，一心為公而不走上圖謀私利的腐敗之路？

## (二) 兼具節制與勇氣的烏托邦領袖

實現烏托邦計畫既然是一趟追求完美之旅，它對領袖自然有著非同凡人的要求。對於單一領袖的強調和重視，在烏托邦文學的傳統裡並非罕見。<sup>136</sup> 至於這位烏托邦領袖的品格，陳周旺指出他必須具備政治美德，將政治統治視為責任和使命而不是追逐名利的手段。如此，個人價值的實現與政治共同體的整體利益就結合起來，別無二致。<sup>137</sup> 在這些政治美德中，陳周旺根據柏拉圖的《理想國》，指出「最為根本乃在於節制與勇氣」。<sup>138</sup> 這幾乎是所有烏托邦文學在描寫其建邦者時，都會突顯的品格。《桃源夢》如是，《羊的門》也不例外。呼天成顯然就是一位把「呼家堡」的整體利益視為個人利益的領袖。當有人來求見呼天成時，呼天成向村秘書楊根寶表露心跡：

「想見我？我知道他們想見我。根寶，人心不足啊。他們想見我，都是有想法的。他們都是人才，難得的人才呀，不然，我也不會……我是幫過他們，我還會幫他們。可我也有我的原則，我的原則是，於呼家堡有利的事我幹……」<sup>139</sup>

呼天成的確事事表明，只要有利於「呼家堡」的事，他都會責無旁貸地做好。此外，他也是一位兼備節制與勇敢的烏托邦領袖。李佩甫通過楊根寶的內心獨白如此描述呼天成的自我節制：

啊，這是個最值得驕傲、最值得自豪的老人，他的輝煌是很多人窮其一

<sup>136</sup> 例如摩爾就論及「烏托邦」乃是烏托普國王智慧的產物。詳見托瑪斯·摩爾著，戴錫齡譯，《烏托邦》，頁96。康帕內拉 (Tommaso Campanella) 亦談及最高統治者「太陽」是一個博學而賢明的人；他會對一切問題和爭端進行最後裁決。詳見康帕內拉著，陳大維、黎思復、黎廷弼合譯，《太陽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6-14。

<sup>137</sup> 陳周旺，《正義之善——論烏托邦的政治意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頁75。

<sup>138</sup> 同前引，頁78。

<sup>139</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57。

生都無法達到的。可他從來沒有驕傲過。他的話總是很含蓄，無論什麼時候都裹著一層讓人無法看清的東西……。<sup>140</sup>

楊根寶跟隨呼天成多年，從未見他「驕傲過」，可見在別人眼中，呼天成向來非常節制。呼天成不像尋常人那樣喜歡炫耀自己的成就，因為「人是活小的」，若然要硬撐「大」的架式，只會不智地招來風雨。<sup>141</sup>除了深明不矜不伐的道理外，他還能克制人欲，做到「拒色輕利」。《孟子·告子上》曾言：「食、色，性也。」<sup>142</sup>這意味著飲食（物質需要）與男女之事（性欲）乃是人的天性；而人的天性往往又是慾望的來源。與凡人不同，面對這兩種人性自然欲望的巨大誘惑，呼天成「自始至終都能把握住自己。」<sup>143</sup>

呼天成六十大壽的時候，表明了「不祝壽，不收禮」。<sup>144</sup>無論客人身分如何，他都只是招待對方吃一頓便飯，一概不見。<sup>145</sup>對於客人硬要留下的禮品，他指示要「一個不留」地全部分給群眾。<sup>146</sup>他的日常生活亦是極簡樸的，只是在一間茅屋裡辦公，並沒有用上村裡豪華的辦公樓。雖然茅屋裝備了暖氣設備、電話、對講機等現代化裝備，<sup>147</sup>卻沒有一樣不是因為有實際需要而添置的。由此可見，呼天成從來不為物欲所累。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這句話不單反映了情慾之於一個人的影響力，更暗示了對英雄而言，情慾的誘惑至難克服。呼天成最大的挑戰同樣來自於此。當年為了換取慣於偷盜的孫布袋協助，呼天成答應過給他找妻子。後來，呼天成就把自己拾（救）回來的「信陽女子」——從南方逃難而來，差點冷死在草庵裡的秀丫配給了孫布袋做妻子。秀丫知道呼天成是她的救命恩人後，就愛上了他，一直希望「以身相許」來報答呼天成。<sup>148</sup>當秀丫第一次求呼天成佔有她的時候，呼天成亦差點把持不住；恰巧在這時候他聽到了「沙拉、沙拉」的腳步聲，及時喚醒了他的理

<sup>140</sup> 同前引，頁 56。

<sup>141</sup> 同前引，頁 353。

<sup>142</sup> 楊伯峻、楊逢彬注譯，《孟子》（長沙：岳麓書社，2000），頁 190。

<sup>143</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385。

<sup>144</sup> 同前引，頁 49。

<sup>145</sup> 同前引。

<sup>146</sup> 同前引，頁 58。

<sup>147</sup> 同前引，頁 54。

<sup>148</sup> 同前引，頁 95-103。

智。<sup>149</sup> 呼天成深受秀丫吸引，甚至每當情慾高漲時，更會在眼前出現一個折磨他的白色幻影；<sup>150</sup> 可是，他卻一直克制著沒有和她發生性關係，因為呼天成知道，「在平原的鄉村，『偷女人』就是偷人家的『屋』呀！這是最讓人憤恨的偷竊行為。」<sup>151</sup> 對呼天成來說，為了成為群眾眼中的「神」，這片土地的「主宰」，即使是一次的錯誤他也不能犯，更不要說被人逮住。對於這種成「神」的思想，本文認為可以借助衣俊卿提出的「烏托邦定勢」來解釋。衣俊卿曾經以此來闡釋人那種對「永恆、無限和完善完滿的渴望與衝動」：<sup>152</sup>

在總體上，烏托邦定勢表現為對人的有限、孤獨和缺憾的境遇的超越，對人的自由及其責任的逃避，對人介乎於自然性和神性之間的特殊存在位置的超越。在具體表現上，這一烏托邦定勢又有兩個基本導向：其一是人通過造神而與神認同或合一；其二是人將自身提高到神的地位。<sup>153</sup>

呼天成既然要「將自身提高到神的地位」，就必須把自己當成敵人來打倒（真正的敵人就是內心的情慾），「他把自己的心一鋸兩半，用這一半來打倒另一半。」<sup>154</sup> 為了戰勝對秀丫的慾念，他更要求徹底被自己迷倒的秀丫脫光躺在床上，而他就在一旁修練《易筋經》。敘述者指出：

這場精神戰持續了很久很久，越練，心中的渴念越小，越練，身上的氣感就越明顯。後來，呼天成覺得，他確實是戰勝自己了，同時也戰勝了外邊的那個「聲音」。作為呼家堡的當家人，在這一點上，他是挺過來了。那麼，在以後的日子裏，就再也沒有過不去的橋了。<sup>155</sup>

為了完全克服一己的私慾，呼天成連深愛自己的秀丫都可以放棄，甚至把她當做自

---

<sup>149</sup> 同前引，頁 103。

<sup>150</sup> 同前引，頁 168。

<sup>151</sup> 同前引，頁 159。

<sup>152</sup> 衣俊卿，《歷史與烏托邦：歷史哲學：走出傳統歷史設計之誤區》（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頁 33。

<sup>153</sup> 同前引，頁 35。

<sup>154</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155。

<sup>155</sup> 同前引，頁 183-184。

已成「神」之路所獻上的「犧牲」。<sup>156</sup> 當他六十大壽的時候，秀丫差遣自己的女兒小雪兒來代替自己「以身相許」給呼天成，好回報昔日的救命之恩時，呼天成還是峻拒了。<sup>157</sup>

呼天成在情慾上的高度節制恰好和另一條敘事線索的呼國慶構成對比。呼國慶雖然人很精明又機智，升任穎平縣縣委書記後，更打算做到「鄉鄉有公路，村村通汽車。」<sup>158</sup> 卻因為情婦謝麗娟而遭到官場上兩次嚴重的挫敗。第一次是為了謝麗娟而決定和妻子離婚——呼國慶設下圈套讓妻子吳廣文和她任教的小學校長發生戀情，再算準時機回家「捉姦」。<sup>159</sup> 誰知道，事情被吳廣文的舅父范騾子識破，還向縣政府告狀。<sup>160</sup> 呼國慶的政敵王華欣更利用此事大造文章。要不是呼天成出手相助，他險些就被罷官。<sup>161</sup> 第二次則是因為謝麗娟找他借曾經承諾的一百萬，結果呼國慶因此私自挪用了打假得來的一筆公款。<sup>162</sup> 事情被揭發後，他和謝麗娟都被抓去審查。<sup>163</sup> 最終還是呼天成出面替他擺平。<sup>164</sup> 當呼天成去見被釋放出來的呼國慶時，就罵他：「為一個女人，你一犯再犯，是狗改不了吃屎啊！」<sup>165</sup> 又指責他之所以會犯同樣的錯誤，全因為「沒有信仰」。<sup>166</sup> 「信仰」在呼天成的理解裡就是「集體」的意思——凡事都以「集體」的利益為依歸。<sup>167</sup> 呼國慶之所以兩次被敵人逮住，主要原因就在於他無法在「集體」利益與個人情感／情慾產生衝突時站穩立場。相反的是，呼天成之所以能夠領導「呼家堡」四十年，正是因為他每次都成功地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情慾，以「集體」的利益為先。

勇氣方面，前文即已述及呼天成為了破除村裡打撈「魂靈」而做的事。他無視村裏根深蒂固的迷信風俗，甚至在小娥的父親劉全提刀尋釁時，不單站在老槐樹下一步都不退縮，還厲聲地喝了他一聲：「劉全，毯樣！你幹啥呢？」劉全就被嚇得

<sup>156</sup> 同前引，頁 183。

<sup>157</sup> 同前引，頁 61-62。

<sup>158</sup> 同前引，頁 342。

<sup>159</sup> 同前引，頁 27-30。

<sup>160</sup> 同前引，頁 41-46。

<sup>161</sup> 同前引，頁 128-139。

<sup>162</sup> 同前引，頁 320-323。

<sup>163</sup> 同前引，頁 347。

<sup>164</sup> 同前引，頁 427。

<sup>165</sup> 同前引，頁 428。

<sup>166</sup> 同前引。

<sup>167</sup> 同前引，頁 67。

跪倒地上。<sup>168</sup> 呼天成所表現出來的勇氣，贏得了全村的敬畏。<sup>169</sup>

### (三) 對於「改革文學」英雄形象的突破

一位為了實現「集體富強」的目標，具備勇氣、節制的卡理斯瑪領袖，不禁讓人想起新時期「改革文學」裡的英雄形象。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堪稱改革文學的代表作，<sup>170</sup> 當中的電機廠廠長喬光樸，為公忘私，全力響應後毛時期中共「四個現代化」的號召，厲行改革，堅決要把生產搞好。這種英雄人物捨己忘身地投入經濟改革的奮鬥之中，成為中共改革開放路線上的急先鋒。陳思和認為，改革文學裡的英雄形象「正好應和了變革時代的人們渴望雷厲風行的『英雄』的社會心理」。<sup>171</sup>

毫無疑問，呼天成和改革文學裡的英雄都是改革開放的忠實擁護者，他們全心追隨鄧小平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判斷——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因為「實現社會主義的首要根本前提應是優先使生產力發展到很高的水平。」<sup>172</sup> 鄧小平在邏輯上並沒有放棄把共產主義視為歷史的終極追求，但他把社會主義限定為經濟發展的觀點，<sup>173</sup> 顯然和毛澤東選擇的道路並不一樣。毛澤東認為「用正確的思想武裝起來的人，能夠克服一切物質困難，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社會」。<sup>174</sup> 就是這種唯意志論的觀點，讓毛澤東相信只要發動人民的積極性，「大躍進」就會取得成功；為了消滅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中國封建儒家文化，讓人的思想「無產階級化」好完成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根本前提，<sup>175</sup> 毛澤東不惜發動了後來造成嚴重社會動盪的「文革」。

呼天成和改革文學的英雄不同，對於中共的政策他並不總是支持。在毛澤東時代，呼天成已經選擇了一條鄧小平相信的道路——當全中國都投身於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期望憑此實現「集體富強」；「呼家堡」的任何政治運動都不離開經濟建

<sup>168</sup> 同前引，頁 94。

<sup>169</sup> 同前引，頁 95。

<sup>170</sup> 丁帆主編，《喬廠長上任記：改革小說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頁 1-50。

<sup>171</sup>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頁 232。

<sup>172</sup> 莫里斯·邁斯納著，《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頁 226。

<sup>173</sup> Maurice Meie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 Wang, 1996), p. 318.

<sup>174</sup> 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 275。

<sup>175</sup> 同前引，頁 276。

設，<sup>176</sup> 成為了一個與外部世界在精神和追求上截然不同的烏托邦。

當「呼家堡」外的「文革」如火如荼之際，「呼家堡」還是平靜得很——全村人在呼天成的帶領下，一心一意種棉花。呼天成還提出了一個口號：「種好棉花，支援世界革命！」敘述者如此評論呼天成的行為：「世界很遙遠，革命也很模糊，只有棉花了。」<sup>177</sup> 本文認為敘述者的這句話不單只透露了呼天成的心聲，亦表示了李佩甫的態度：對生活貧困的廣大農民來說，沒有事情比搞好經濟生產，改善生活更重要。這一點不是和鄧小平的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相一致嗎？

不錯，當「文革」的火焰幾乎燒到「呼家堡」時，呼天成壓根兒不打算參與。他首先設下計謀，讓戴著紅袖標，嚷著要「造反」的八圈「偷女人」，再讓他負責挑糞以示懲處，叫村裡無人敢再提「造反」。<sup>178</sup> 面對各地來的紅衛兵，他就以虛應的方法應付：不論誰來到他都說支持，都吩咐人刷大字報貼了滿村街；但只要對方一走，他就命人趕緊揭了大字報，拿去燒火。<sup>179</sup> 呼天成就像先知一樣洞悉了歷史的最終走向，不單致力於生產力的解放，更避免讓「呼家堡」捲入外部世界的政治運動之中，好保障「呼家堡」人的生活，同時鞏固他的卡理斯瑪領袖地位。當「呼家堡」平安無事地度過了「文革」，迎來席卷全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潮時，呼天成終於能夠一展所長。他動用在各地官場積累的人脈，為「呼家堡」取得各種「批文」，進口新型麵粉設備，大量生產「呼家麵」；<sup>180</sup> 又不惜斥巨資從省糧食學院請來一位董教授，要引入他的食品保鮮技術（此舉不禁叫人想起鄧小平的另一句名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sup>181</sup> 目的就是要把「呼家麵」打造成系列化產品。僅僅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呼家堡」便實現了「集體富強」的目標。李佩甫似乎想要透過《羊的門》來說明，只要集中全力發展經濟，毛式烏托邦主義的承諾和追求都不是遙遠的夢想。

然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在帶來物質進步的同時，政府幹部的腐敗問題卻變得越來越嚴重，民眾倍感恐慌和憤怒。<sup>182</sup> 邁斯納毫不含糊地指出，鄧小平的改革造

<sup>176</sup> 例如「呼家堡」的「鬥私批修」運動是為了去除私心，卻不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次運動亦不是要反對修正主義，與共產黨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作鬥爭，而是為了聚人心，建「新村」。李佩甫，《羊的門》，頁 214-230。

<sup>177</sup> 同前引，頁 156。

<sup>178</sup> 同前引，頁 156-160。

<sup>179</sup> 同前引，頁 161-162。

<sup>180</sup> 同前引，頁 364。

<sup>181</sup> 同前引，頁 366-372。

<sup>182</sup> 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 439。

成了意識形態上的真空和道德荒漠。<sup>183</sup> 面對社會不公的日趨嚴重，人們對反腐（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要求，最終造成 1989 年的民主運動「六四事件」。<sup>184</sup> 民主運動招來官方的血腥鎮壓，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個人主義（idealistic individualism）遭受嚴重挫折；民眾追尋自由和民主的動力，徹底轉化為赤裸的享樂主義（crude hedonism）<sup>185</sup>——除了經濟利益外，民眾別無關心。於是，1990 年代就出現了孟繁華提到的情況：

特別是 90 年代以來，經濟的巨大發展越來越接近於啟蒙主義者夢想的現代化，但現實又無情地顯現了它另一方面的殘酷。生活中充滿了荒誕，物質的極大豐富也導致了道德的進一步淪喪，唯利是圖、人欲橫流，人潛在的各種欲望越發表面化並逐漸地趨於「合法化」，人們對終極關懷、普遍價值的關切已為切近的個人利益所替代。<sup>186</sup>

「改革文學」無法料想的是，英雄們一度擁抱的經濟改革，最後只造成一個人人都只關注「切近的個人利益」的時代。寫成於 1999 年的《羊的門》無法迴避各種社會腐敗的事實，因此李佩甫呼喚呼天成的出現——他在面對經濟改革帶來的巨大物質誘惑時，絲毫不為所動；面對手下的腐敗行為，又絕對鐵面無私。例如私自收了五條煙、四瓶酒的麵粉廠廠長王炳燦，呼天成不但免去他的職務，還連續在「呼家堡」開了一個月的「洗手會」，要他端著一盆清水走上臺，當著全村人的面「洗手」以示悔改。<sup>187</sup> 呼天成一心要讓「呼家堡」成為一塊「淨地」，只容有「公」，不敢存「私」。<sup>188</sup> 只有自始至終都兼具節制和勇氣的呼天成，才配當上時代的偉大舵手，成為渴望得到豐足安定生活的民眾之集體意志化身。同時，「呼家堡」因為有了呼天成，才擁有一個「一心為公」的道德楷模，供「呼家堡」的成員效法，保持烏托邦的道德純淨。

<sup>183</sup> Maurice Meie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p. 508.

<sup>184</sup>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p. 8.

<sup>185</sup> 同前引，頁 203-204。

<sup>186</sup> 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通論》，頁 334。

<sup>187</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378。

<sup>188</sup> 同前引，頁 377。

#### (四)「羊的門」與羊——「救主」與「被拯救者」

對偉大舵手的呼喚，毫無疑問是一種期待救世主的意識。領袖與人民的關係，是《羊的門》其中一個重要主題。

在平原上四十年不倒的呼天成，可說實現了當年的自許：「我就是他們的主，我要當好這個主。」<sup>189</sup>《羊的門》在扉頁上引用了《聖經·約翰福音》的話，更是評論者關注的焦點：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盜、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聖經·約翰福音》第十章 7-10 節）

對於這段話，何弘如此解讀：

這段話出自《新約全書·約翰福音》，可以說是李佩甫給他的作品所做的題注。基於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羊」就是作品所描寫的廣大民眾。或者說「人民」，也就是芸芸眾生；而「羊的門」就是「主」，在《羊的門》中，「羊的門」可以說就是呼天成，或者說呼天成自認自己就是「羊的門」。

基於這樣的認識，當時在談論《羊的門》時我說，正因此，我們從呼家堡這個小小的村子中看到了整個中國和它的歷史。<sup>190</sup>

何弘對「羊」和「羊的門」這個比喻的解讀，幾乎成為後來評論者的共識。<sup>191</sup> 譚晉宇早就留意到《羊的門》這個題目表現了民眾渴望「救主」的文化心態。<sup>192</sup> 小

<sup>189</sup> 同前引，頁 81。

<sup>190</sup> 何弘，〈眾說紛紜《羊的門》〉，頁 282。

<sup>191</sup> 郭力認為，「結合小說中人物四十年人生歷程，可以肯定呼天成就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他在村中君臨天下」。郭力，〈穿行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寓言寫作——《羊的門》閱讀札記〉，頁 104。王洪輝與郝崇則認為「所有的『羊』——民眾都得到滿足，所謂的『門』——神（主人）的地位得到空前尊重」。王洪輝、郝崇，〈《羊的門》的家族神話與悲劇性反諷——陷落的烏托邦〉，頁 12。

<sup>192</sup> 譚晉宇，〈論《羊的門》對現代性和國民性的思考〉，《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1（婁底：

說在扉頁引用聖經除了暗示一種民眾對於「救主」的呼喚外，更展現了民眾對「救主」懷有的宗教意識。韋伯在談到卡理斯瑪支配時，就多次以先知和信徒的關係來說明，可見宗教性情感往往是卡理斯瑪支配的前提。談到卡理斯瑪支配和官僚支配的分別時，韋伯特別指出卡理斯瑪支配是非理性的，因為它不受任何規則制約，而官僚支配則受到理智可解的規則之限制。對於卡理斯瑪領袖的跟隨者而言，只要他們一天相信及承認領袖的卡理斯瑪，卡理斯瑪支配就會發揮作用，跟隨者會對領袖完全效忠和獻身。<sup>193</sup> 由此可見，《羊的門》引用聖經的經文，正是要暗示呼天成和「呼家堡」人之間，存在著一種「救主」與「被拯救者」的關係。

那麼，「呼家堡」人為何會樂意成為「被拯救者」（而不是集合群眾之力來自我拯救）？呼天成為什麼會自視為「救主」？根據金澤的分析，推崇「民本思想」的儒家文化，造成了傳統社會裡大眾意識的一股潛流，「即濃重的崇拜救世主的意識。」<sup>194</sup> 於是，每當社會發生危機，人民就會期待能夠重整山河的英雄誕生。<sup>195</sup> 這種英雄，往往披著「民本主義」的龍袍登基，滿足人民要求安定統一的願望。<sup>196</sup> 在儒家文化裡，這種英雄顯然就是堯、舜之類「以民為本」，「以天下為己任」的聖君。聖君是後世人君和世人學習的模範，因為聖君治國一定會為世人帶來和平安定。《孟子·滕文公上》曾經引述了孔子的一段話，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sup>197</sup> 這種強調君主以個人德行為天下人楷模，重視上行下效的治國理念，相信君主能夠以優越的德行感化或改造天下人。

單是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作用並不足以令一般民眾都期盼救主的誕生。社會的實際環境是否惡劣，救主本身的領袖魅力也是重要因素。正如前文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前三十年一直發生各種政治運動，「大躍進」和「文革」造成的破壞相當深遠。呼天成顯然早在毛澤東時代便全心追隨鄧小平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

2008），頁 93。遺憾的是，譚晉宇對此並沒有進一步解釋。

<sup>193</sup> 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編譯，《韋伯選集Ⅲ：支配的類型》，頁 70-72。

<sup>194</sup> 中國的農民由於從來沒有真正獨立自主過，耕作又有賴於高度集權的國家機器保護，慣性服從統一的號令，結果造成自身個性脆弱；他們一廂情願地希望統治者「以民為本」，但其實骨子裡有一種奴性，希望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他人來主宰。詳見金澤，《英雄崇拜與文化形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頁 87。

<sup>195</sup> 在金澤的分析裡，基督教的救主耶穌都屬於英雄的一種。因此本節在引用金澤對「英雄」的分析時，同樣適用於「救主」。同前引，頁 41。

<sup>196</sup> 同前引，頁 102。

<sup>197</sup> 楊伯峻、楊逢彬注譯，《孟子》，頁 81。

的判斷——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共產黨的工作重心。這一點從「呼家堡」的任何政治運動都不離開經濟建設的主旋律可見一斑。在這個意義上，呼天成以「集體」為信仰（也是一種「民本思想」），兼具節制和勇氣，當然覺得自己有條件做「呼家堡」的「救主」，成為「當代聖君」。

#### 四、《羊的門》的烏托邦書寫之價值——

##### 以另一種歷史出路來批判社會

《羊的門》在銷售上取得重大成功，與它揭示了官場的勾心鬥角與權力腐敗，滿足讀者觀看奇觀的心理不無關係。又，誠如孟繁華所言，李佩甫創造了呼天成「這個複雜的、既有中國傳統又有現代文明特徵的中原農民形象，是小說取得的最大成就。」<sup>198</sup> 本文認為呼天成的聖君姿態，契合了改革開放洪流之下，身受官場腐敗之苦的中國人對於新一任偉大舵手的期盼，這是小說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此外，《羊的門》的烏托邦書寫所產生的批判力量，也是它吸引讀者的另一要素。本節將會圍繞小說的烏托邦書寫之價值來開展討論。

「呼家堡」的「堡」字本來就暗示了它擁有「塢堡」或「堡壘」的特性，和「屋」一樣，既是前文述及的種種烏托邦追求的具體呈現，亦是與外部世界抗衡的場所。「呼家堡」的淨土特性顯現了烏托邦文學通常具有的二重性特質。所謂二重性，可以有兩種理解：第一，小說內部呈現了兩個對比極大的世界——一個是黑暗、不幸的世界，另一個則是理想的、美好的烏托邦。第二，若然小說擁有明確的現實背景，將其置回小說生成的時代脈絡，小說描繪的烏托邦與作家身處的現實世界將構成強烈對比，產生一種批判的力量——那就是以烏托邦的理想狀態來突顯現實的不足，情形就像何冠驥所言，小說中的烏托邦既然是作者憧憬的美好世界，往往就有一種批判精神。只有對現實社會心存不滿，才有設計烏托邦的需要。<sup>199</sup> 張惠娟嘗論及，有批評家認為摩爾撰寫《烏托邦》，絕非遊戲之作，反而被摩爾及同時代之人，視為一本指導統治者治國的書。<sup>200</sup> 若然翻開《烏托邦》，不難發現此

<sup>198</sup> 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通論》，頁 370。

<sup>199</sup> 何冠驥，《借鏡與類比——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臺北：東大圖書，1989），〈幸福保證的謊言——論烏托邦的真面目〉，頁 262。

<sup>200</sup>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中外文學》，15.3（臺北：1986），頁 83。

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摩爾大力批評當日英國政治的黑暗，著力描繪英國農民的悲慘境遇；第二部分則是關於一個理想國家的描述。全書以一反一正的結構組成，以鮮明的對比色彩展現了作者對現實社會的不滿。這種批判力量，便是透過兩個世界的對比來達成。

值得注意的是，與「呼家堡」這個烏托邦進行對比的混亂現實，卻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烏托邦運動造成的。慈繼偉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以後由毛澤東發起了兩次大型烏托邦運動，分別是「大躍進」和「文革」。<sup>201</sup> 對於這兩次烏托邦運動，《羊的門》皆有明確回應，並以「呼家堡」作為「另一個歷史假說」，<sup>202</sup> 設想歷史的可能走向之餘，對烏托邦運動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批判。

三年「大躍進」所造成的「三年嚴重困難」（三年大饑荒），<sup>203</sup> 造成了一千多萬到四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sup>204</sup> 河南省的信陽更是重災區，僅是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10 月，死亡人數就達一百零七萬多人，佔全區總人口的 13.2%，事件大大震動中央政府。<sup>205</sup> 《羊的門》對此亦有提及：迷戀呼天成的女子秀丫之所以被稱為「信陽女子」，就是因為她是從南方跑來的，而「呼家堡」的人當時已知道南方信陽鬧饑荒，死了很多人。<sup>206</sup> 「呼家堡」不但無一人餓死，還有多餘的紅薯和小米救回秀丫，<sup>207</sup> 在經歷嚴重饑荒的河南省堪稱奇蹟。<sup>208</sup>

「文革」並沒有如毛澤東設想的那樣帶來一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社會，卻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動盪。《羊的門》對「文革」著墨有限，但敘述者的這段話充分表現了李佩甫的態度：「那會兒城裏的『革命』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幾乎每天都有死人的消息。」<sup>209</sup> 「文革」造成的混亂狀態與農民期望的安穩生活背道而馳。因此，「呼家堡」在「文革」期間只是一心一意務實地從事經濟生產，藉此避免了投入政治運動而造成的內部傾軋與不安。<sup>210</sup>

<sup>201</sup> 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p. 226.

<sup>202</sup> 達高·蘇文 (Darko Surin) 認為烏托邦的誕生源自對歷史出路的另一假設。Darko Surin, "The Alternative Island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SF, with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in the SF of Antiquity,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Science-Fiction Studies*, 3 (1976), p. 242.

<sup>203</sup>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1958-1961)》，頁 615。

<sup>204</sup> 關於「三年嚴重困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學者有不同說法。同前引，頁 619-624。

<sup>205</sup> 同前引，頁 605-614。

<sup>206</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99-100。

<sup>207</sup> 同前引，頁 98。

<sup>208</sup>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1958-1961)》，頁 607。

<sup>209</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161。

<sup>210</sup> 事實上，當城市陷入一片混亂時，大多數農村地區在政治上依然比較平靜，只有城郊的一些村莊

兩場烏托邦運動結束後，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雖然帶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但市場化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結果卻無可避免地造成官僚資本主義橫行。<sup>211</sup> 誠如 C. M. 漢 (C. M. Hann) 所言，共產黨無法解決由於「關係」和「腐敗」所造成的道德困境。<sup>212</sup> 這一點從「呼家堡」外的世界可以清楚看見，例如呼國慶供職的潁平縣，既有地方政府庇蔭，造假達到國際水平的「造假村」；又有由教育局開辦，生產春藥的「粉筆廠」。<sup>213</sup> 政府官員大都貪污受賄，<sup>214</sup> 生活腐化，<sup>215</sup> 官場鬥爭無日無之。<sup>216</sup> 呼國慶雖然是呼天成一手培育出來的人才，抱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態，努力為老百姓辦事，但他最後都在官場鬥爭上敗給政敵副市長王華欣，被捕下野。<sup>217</sup> 要不是呼天成出手相救，恐怕難逃牢獄之災。然而，「呼家堡」則在呼天成的領導下，把握市場經濟的機遇，堅持「公有制」的路線，凡事以「集體富強」為念，實現了「均平」的理想。這種烏托邦文學的二重性特質，又與小說的敘述手法互相結合。《羊的門》採用的是雙線敘述，第一章以呼天成為敘述重心，第二章則為呼國慶，第三章又回到呼天成……如此類推。當然，兩者的故事互有關連和穿插，但本文想要指出的是，呼國慶那一線的故事，全部是以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為背景，而呼天成領導的「呼家堡」，並沒有在「大躍進」或「文革」成為典型模範，卻在改革開放後始成為平原第一村。

不容忽視的是，烏托邦文學提出的往往是對「整體」社會的療法，而不侷限於

---

時會捲入「文革」的鬧爭中。詳見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 330。然而，從小說提到不斷有紅衛兵到訪「呼家堡」可見，「呼家堡」可能屬於邁斯納提到的這一類城郊村莊。

<sup>211</sup> 同前引，頁 440-444。官僚資本主義就是「使用政治權力和影響力、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方式謀取私利的資本主義。」邁斯納認為，這是中國在實現開放改革以後日趨普遍的現象。

<sup>212</sup> C. M. 漢著，苑潔譯，〈後社會主義——歐亞的理想、意識形態和實踐〉，收入苑潔編，《後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頁 77。

<sup>213</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187、252。

<sup>214</sup> 小說載有大量官員受賄的情節，敘述者更寫道平原上有一句話，名叫「跑一跑」，意即遇到難關時便找熟人、拉關係、走門路，然後打通一道道關節；這裡面亦包含了請客、送禮、行賄等內容。例如「造假村」的村長為了脫罪，在王華欣的暗示下，拿了一幅字畫去賄賂省煙草局的副局長梅春海。同前引，頁 256、261-262。

<sup>215</sup> 小說曾描述主角呼國慶背著妻子，在別墅與情婦謝麗娟放浪形骸地過了「金屋藏嬌」的三天。同前引，頁 323-329。

<sup>216</sup> 呼國慶的那條敘事線索，便是圍繞著他和政敵王華欣之間連綿不斷的官場鬥爭。

<sup>217</sup> 此事和呼國慶本身私德有虧有關。他允諾為辭職下海的情婦謝麗娟弄一百萬為起動資金，謝麗娟當時雖然沒有答應，兩年半以後卻要求他兌現承諾。結果，此事成為了王華欣扳倒他的重要把柄。當呼國慶允諾給謝麗娟一百萬做為「分手費」時，敘述者評論道：「他（筆者按：呼國慶）絕不會想到，就是這麼一句話，也會給他種下禍根。」同前引，頁 208-209。

「個別」地區。例如摩爾《烏托邦》設想的就是一個國家的理想走向；貝拉米《回顧 2000-1887》設想的則是一個進入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美國；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期待的也是一個強大的立憲中國。可是，李佩甫並沒有為中國設想未來，也沒有為共產黨應該如何改革，解決官僚資本主義橫行造成的惡果提出應對之法。或者，歷經中共建國後的兩場失敗的烏托邦運動，以及改革開放造成的官場腐敗，李佩甫無意也無力在《羊的門》設想中國「整體」社會的未來；他關心的是如何在中國「個別」農村實踐「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可能性。李佩甫念茲在茲的是，如何一邊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致富，一邊避開改革開放所產生的貪腐問題。然而，李佩甫只是期望個別官員像呼天成那樣潔身自愛，憑著對「集體」的信仰，施政「以民為本」。他就像傳統儒家一樣盼望聖君的出現。在此，《羊的門》雖然展現了對於「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追求，但它對於當代聖君的強調，可謂不離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限定。

## 五、結語

《羊的門》會在二十世紀末問世，有其歷史背景。錢理群指出，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後，中國社會逐漸出現了新階層，其中之一就是「權貴資本階層」。<sup>218</sup> 對於「權貴資本階層」精神面貌的探討及其貪污腐敗的批判，構成了 1990 年代「官場小說」的主題。王躍文《國畫》、《梅次的故事》、閻真《滄浪之水》皆探討了「權貴資本階層」的精神面貌，這些小說和《羊的門》一樣，既批判官僚資本主義造成的惡果，又批判了造成權力腐敗的文化土壤。<sup>219</sup> 由是觀之，《羊的門》自可列入「官場小說」的譜系來進一步探討。

然而，《羊的門》除了撻伐官場貪腐，亦是一部充滿了各種思考的小說。李佩甫曾經說過，「中國文學相當長時間滯於一定創作層面上對特定歷史時期的階段性思考，而不是對一民族精神的總體思考」。<sup>220</sup> 本文認為，對於長期以文學來關心、思考中國鄉土的李佩甫而言，<sup>221</sup>《羊的門》寫成於 1990 年代，不妨視為一部

<sup>218</sup>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臺北：聯經出版，2012），頁 263-268。

<sup>219</sup> 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通論》，頁 369-375。

<sup>220</sup> 何向陽、李佩甫，〈對話：文學與人的神話〉，《莽原》，3（鄭州：1996），頁 76。

<sup>221</sup> 李佩甫剛踏上文壇時，便寫作了一批鄉土作品，如《紅螞蚱綠螞蚱》、《鄉村蒙太奇》等。長篇小說《李氏家族》、《金屋》寫的依舊是鄉村；《城的燈》的背景雖然是城市，卻是一本探討農

期待在總體上把握中國農民精神特質以及思考中共建國以來，中國農村怎樣才能擺脫長年的貧困的小說。

從烏托邦書寫的角度切入，「呼家堡」可說是一個實現了「集體富強」、「均平」和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一條貧困的農村，憑著卡理斯瑪領袖呼天成的領導，在中國改革開放之際以「新集體主義」實現了「毛式烏托邦主義」的未踐之約。

呼天成既是小說的主角，也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創建者。要成為烏托邦領袖，李佩甫告訴我們，他必須是集節制與勇氣於一身的卡理斯瑪領袖。呼天成的人物形象雖然與「改革文學」的英雄遙相呼應，但他並不總是跟著黨的路線走。他的超卓遠見和「以民為本」的管治態度，隱然帶有儒家聖君的身影。由此可見，在改革開放造成的道德荒漠上呼喚呼天成這類「救主」可謂《羊的門》的主題；這點見於小說的名字「羊的門」以及引用的相關聖經經文。

中共為中國帶來了「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憧憬，並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真心追求「共產主義天堂」。可是，兩次大型烏托邦運動均以失敗告終，叫人不得不正視實踐烏托邦所帶來的禍害。然而，中國貧苦農民始終時刻渴望一位強而有力的「救主」，能夠帶領他們建造一條富強的新村，讓他們過上安定的生活。曾被人民公社「大鍋飯」餵飽的經驗讓他們選擇了「新集體主義」；改革開放所造成的激烈競爭和赤裸的利己主義，則重新喚起人們對「集體富強」、公有制、「均平」等毛式烏托邦主義理想的渴望。從小說可見，渴望救主的文化心態在農村尤為明顯，足見農村依然深受中國文化深層結構影響。

《羊的門》以烏托邦書寫構築另一條歷史出路，展現了對於共和國歷史和中共政府幹部貪腐的批判；還有李佩甫對於個別農村如何把握改革開放帶來的機遇，走上「共產主義烏托邦」之路的思考。

《羊的門》的結局停在呼天成彌留之際，「呼家堡」的將來懸而未決。呼天成畢竟不是聖經所載的耶穌基督，復活升天之後永遠不死；他只是難逃一死的凡人，因此「呼家堡」就像卡爾·巴柏 (Karl Popper, 1902-1994) 所言，「烏托邦工程學的另一難題是有關『獨裁者的繼承問題』」——後繼者萬一不再追求相同的理想，之前為烏托邦理想付出的代價就付諸流水了。<sup>222</sup>「呼家堡」必須面對繼承者的問

---

民走進城市後如何自處的小說。對於李佩甫小說的整體評價，詳見李丹夢，〈李佩甫論〉，《文藝爭鳴》，2（長春：2007），頁 142-151。

<sup>222</sup> 卡爾·巴柏著，莊文瑞、李英明編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臺北：桂冠圖書，1988），頁 379。

題。當呼天成自知大去之期已近，希望培養呼國慶當繼任人。然而，當呼國慶還在考慮之際，呼天成突然發高燒，生死未卜。<sup>223</sup> 當「呼家堡」人都乖乖地成為了呼天成領導下的羊，失去了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呼家堡」會否在呼天成死後一夜瓦解？《羊的門》呼喚呼天成的出現，然而屬人的「救主」終究難逃一死；呼天成即使康復，誰能保證他一生都不會犯錯？一生都不會背棄「集體富強」的信仰？李佩甫試圖在《羊的門》叩問「共產主義烏托邦」如何在今天中國的「個別」農村實踐，但在小說的終局之處，與其說李佩甫展開了一種開放式結局，不如說是作家本人對繼續想像「呼家堡」的未來感到困惑。如果 1989 年的「六四事件」讓中國作家難以透過烏托邦書寫來設想一個帶來自由、民主的烏托邦，甚至堵住了中國作家想像任何在中國大地上可能發生的、在中共允許範圍以外的政治體制變革，那些「呼家堡」難以規避的侷限，會否隱含了對於當下政治體制的諷刺？

現實中的南街村在王宏斌的獨斷下，2003 年投入研發「永動機」，結果虧本收場。由於市場競爭越來越劇烈，2004 到 2005 年之間，南街村不單收入急跌，更面對宏觀調控所造成的信貸收縮問題。面對這種困局，王宏斌在 2004 年決定進行股改，以股權激勵人心，結果是在法律上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私人控股」。<sup>224</sup> 歷史無常，一手打造「共產主義小社區」的王宏斌，卻是親手把它結束的人。若然呼天成一病不起，呼國慶是否能夠維持「呼家堡」亦成疑問；更別說呼國慶拒絕繼任的話，「呼家堡」將會何去何從。

（責任校對：林雅鈴）

<sup>223</sup> 李佩甫，《羊的門》，頁 430-431。

<sup>224</sup> 深度，〈一個歷史符號的終結·南街村上演股權激勵·王宏斌變身紅色資本家〉，《第一財經日報》（上海），2008 年 1 月 17 日，版 A06。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楊伯峻、楊逢彬注譯，《孟子》，長沙：岳麓書社，2000。

### 二、近人論著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於 1986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20331\\_15380.htm](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20331_15380.htm)，2011 年 12 月 8 日下載。
- 〈今日南街村〉，《中國改革報·世紀風》（北京），2000 年 11 月 14 日，版 8。
- 〈《共和國作家文庫》首推 80 部〉，《光明日報·讀書》（北京），2009 年 10 月 21 日，版 12。
- 〈奉行共產衣食無憂〉，《明報·中國》（香港），2004 年 2 月 27 日，版 A25。
- 〈漯河——中原一顆璀璨的明珠〉，《大公報·河南新聞》（香港），2000 年 8 月 18 日，版 D03。
- C. M. 漢 (C. M. Hann) 著，苑潔譯，〈後社會主義——歐亞的理想、意識形態和實踐〉，收入苑潔編，《後社會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頁 73-81。
- 丁帆主編，《喬廠長上任記：改革小說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 丁增武，〈「批判」的恢復——析《羊的門》的主題意向〉，《小說評論》，1，西安：2000，頁 34-37。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暨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 王洪輝、郝崇，〈《羊的門》的家族神話與悲劇性反諷——陷落的烏托邦〉，《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3，吉林：2003，頁 12-15。
- \* 王穎，《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的再組織》，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
- 卡爾·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著，姚仁權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卡爾·巴柏 (Karl Popper) 著，莊文瑞、李英明編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臺北：桂冠圖書，1988。
- 加斯東·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 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2003。

- 托瑪斯·摩爾 (Thomas More) 著，戴錙齡譯，《烏托邦》，臺北：志文出版社，2005。
- 衣俊卿，《歷史與烏托邦：歷史哲學：走出傳統歷史設計之誤區》，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
- \* 何 弘，〈眾說紛紜《羊的門》〉，《莽原》，6，鄭州：1999，頁 281-292。
- 何向陽、李佩甫，〈對話：文學與人的神話〉，《莽原》，3，鄭州：1996，頁 71-79。
- 何冠驥，《借鏡與類比——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臺北：東大圖書，1989。
- 宋連生，《農業學大寨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 李永熾，〈近現代的烏托邦世界〉，《當代》，61，臺北：1991，頁 22-31。
- 李丹夢，〈李佩甫論〉，《文藝爭鳴》，2，長春：2007，頁 142-151。
- 李伯勇，〈「村婦性生存」的全息裸示——《羊的門》閱讀筆記〉，《小說評論》，1，西安：2000，頁 45-49。
- 李佩甫，《羊的門》，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臺北：生智出版社，2003。
- 李博微，〈論李佩甫小說的文化批判主題〉，《開封大學學報》，21.1，開封：2007，頁 35-38。
-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文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 汪 暉，《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辛 田，〈「五四」時期社會主義的嘗試與反思〉，《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9 增刊，長安：2000，頁 308-310。
- \* 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通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
- 林之為民，〈暢銷小說《羊的門》印象（一）〉，《大公報·集萃》（香港），1999 年 9 月 19 日，版 C07。
-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1958-1961)》，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4 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2008。
- 金 澤，《英雄崇拜與文化形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
- 金觀濤、劉青峰，《新十日談：關於文化重建與中國前途的對話》，香港：天地圖書，1990。
- \_\_\_\_\_，《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收入《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第 1 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胡永吉，《李佩甫家族小說與文化選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
- 胡煥龍，〈沉痛的歷史與文化反思——讀李佩甫長篇小說《羊的門》〉，《淮南師範學院學報》，4.4，淮南：2002，頁 42-46。

-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馬克思 (Karl Marx)、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合著，博古譯，《共產黨宣言》，北京：解放社，1949。
- 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 著，康樂編譯，《韋伯選集Ⅲ：支配的類型》，臺北：允晨出版社，1985。
- 周仕寶，〈《1984 年》所揭示之烏托邦政治理念之負面效應〉，《淡江人文社會學刊》，11，臺北：2002，頁 93-101。
- 高曉聲，《高曉聲精選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 康帕內拉 (Tommaso Campanella) 著，陳大維、黎思復、黎廷弼合譯，《太陽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 張宇，〈打開《羊的門》〉，《當代作家評論》，3，瀋陽：2000，頁 24-28。
-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中外文學》，15.3，臺北：1986，頁 78-102。
- 張德勝，《社會原理》，臺北：巨流圖書，1986。
- 深度，〈一個歷史符號的終結·南街村上演股權激勵·王宏斌變身紅色資本家〉，《第一財經日報》（上海），2008 年 1 月 17 日，版 A06。
-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與馬克思、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 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 郭力，〈穿行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寓言寫作——《羊的門》閱讀札記〉，《北方論叢》，6，哈爾濱：2000，頁 104-108。
- 陳行之，〈在思想者陣地上沒有中國當代文學的身影〉，<http://chenxingzhi.blogchina.com/509392.html>，2013 年 2 月 4 日下載。
- 陳周旺，《正義之善——論烏托邦的政治意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 陳宣良，〈「我們」的道德意識結構——從小說《羊的門》說起〉，《開放時代》，3，廣州：2004，頁 139-155。
- 陳萌，〈萬般風情，寫透官場——讀《官場故事》〉，《大公報·書話》（香港），2000 年 3 月 12 日，版 C02。
- 喬·奧·赫茨勒 (Joyce Oramel Hertzler) 著，張兆麟等譯，《烏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 程獻，《晚清鄉土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 黃書泉，〈長篇小說閱讀札記〉，《小說評論》，1，西安：2000，頁 38-44。

- 劉思謙，〈卡理斯馬型人物與女性——《羊的門》及其他〉，《當代作家評論》，3，瀋陽：2000，頁33-38。
- 劉 倩，《南街社會》，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 潘恩強編，《論共有制與私有制》，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5。
- 蔣興普，《呼天成與呼家堡的命運》，長春：吉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
- 學 爾，〈文學作品怎能「克隆」〉，《中國化工報·天地爐》（北京），2000年9月14日，版7。
-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臺北：聯經出版，2012。
- 謝江平，《反烏托邦思想的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 譚晉宇，〈論《羊的門》對現代性和國民性的思考〉，《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1，婁底：2008，頁92-94。
- 關向光，〈一九五八年中國大陸人民公社之產生及其理念根源〉，《東亞季刊》，33.2，臺北：2002，頁1-31。
- 顧 彬著，范勁等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 Chow, William C. L. "Chou Tso-jen and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 *Chinese Studies*, 10.1, 1992, pp. 105-135.
- \* Ci, Jiwe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Dirlik, Arif. *Marx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 Jacoby, Russell.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Jameson, Fredric.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Verso, 2007.
- \* Kumar, Krishan.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eisner, Maurice.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 Eight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 \* \_\_\_\_\_.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 Wang, 1996.
- Suvin, Darko. "The Alternative Island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SF, with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in the SF of Antiquity,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Science-Fiction Studies*, 3, 1976, pp. 239-248.

- 
- \* Weber, Max. "The 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 in A. Etzioni and E. Etzioni-Halevy (eds.), *Social Change: Sources,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43-5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ow, William C. L. "Chou Tso-jen and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 *Chinese Studies*, 10.1, 1992, pp. 105-135.
- Ci, Jiwe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e, Hong. "Zhongshuo Fenyun *Yang de Men*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Gate for Sheep*)," *Mangyuan (Wilderness)*, 6, 1999, pp. 281-292.
- Kumar, Krishan.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eisner, Maurice.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 Wang, 1996.
- Meng, Fanhua.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Tonglu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2009.
- Wang, Ying. *Xinjiti Zhuyi: Xiangcun Shehui de Zaizuzhi (New Collectivism: The Reorgan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Beijing: Economy and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1996.
- Weber, Max. "The 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 in A. Etzioni and E. Etzioni-Halevy (eds.), *Social Change: Sources,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43-53.

## Red Blossom on the Plain: An Inquisition of the Utopian Writing in Li Peifu's *The Gate for Sheep*

**Chau, Man-lut**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 ABSTRAC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Gate for Sheep* 羊的門, written by Li Peifu 李佩甫, was immediately halted through political intervention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1999. Perhap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re have not been comprehensive analyses about the artistic image of Hu Jiabao 呼家堡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topian Writing, nor have there been investigations about how the novel relates to Chinese history, despite the short-lived popularity of the novel.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of Hu Jiabao village with Utopia, Maoist Utopianism, and New Collectivism. Then it investigates the leadership image of Hu Tiancheng 呼天成,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and the public, which explains the unique meaning of his character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long-existing expectation that Chinese peasants had for a “savior.” Finally, the meaning of the Utopian writing in *The Gate for Sheep* is investigated—Hu Jiabao village is an escape route for peasants throughout history, and the novel expresses the criticism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writer toward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Li Peifu, *The Gate for Sheep*, Utopia, Maoist utopianism, New Collectivism, the new era of Chinese literature

(收稿日期：2012. 2. 1.；修正稿日期：2012. 4. 23.；通過刊登日期：2012. 7. 12.)